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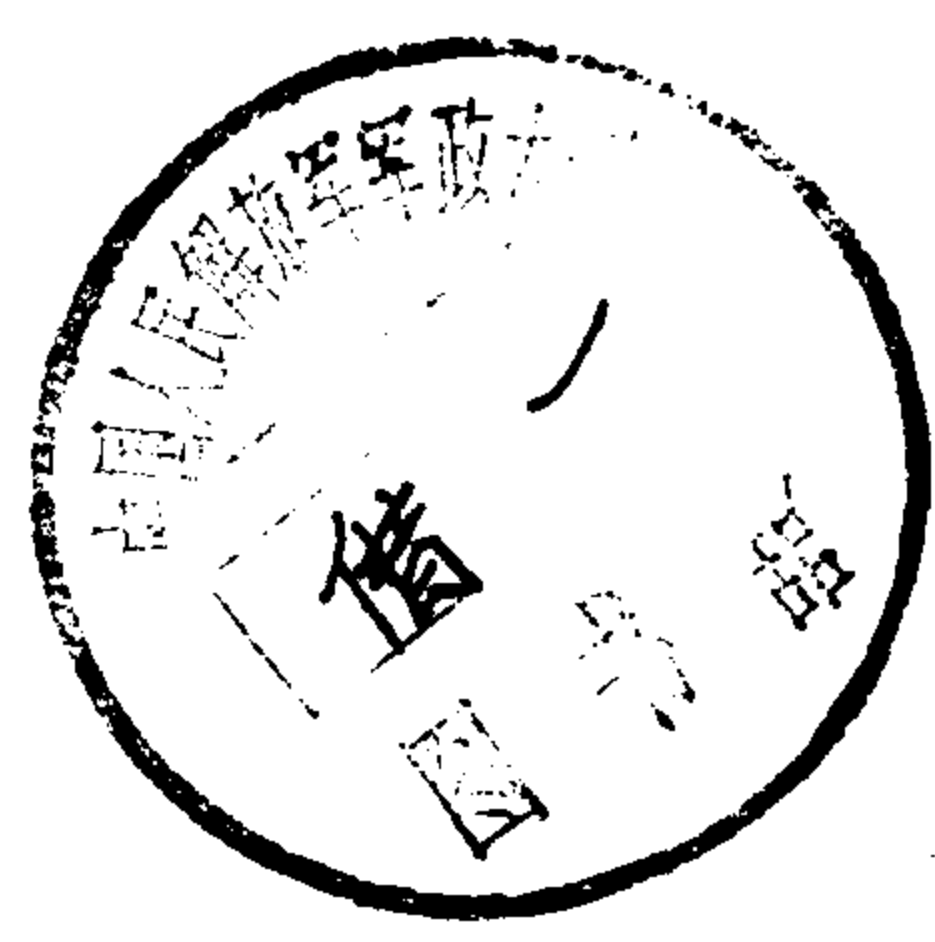


# 鲁迅杂文选

上

(一九一八——一九三二)

复旦大学中文系选编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Handwritten signature*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毛主席语录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 目 录

我之节烈观·····	1
《呐喊》自序·····	15
未有天才之前·····	23
忽然想到(五至六)·····	28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4
一点比喻·····	48
我还不能“带住”·····	52
无花的蔷薇之二·····	58
纪念刘和珍君·····	64
写在《坟》后面·····	7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79
答有恒先生·····	111
文艺与革命·····	119
铲共大观·····	12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26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29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53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57
“好政府主义”·····	165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68
黑暗中国的艺术界的现状.....	172
上海文艺之一瞥.....	178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97
“友邦惊诧”论.....	209
答北斗杂志社问.....	213
《三闲集》序言.....	215
《二心集》序言.....	221
论“第三种人”.....	226
“连环图画”辩护.....	233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241

# 我之节烈观<sup>①</sup>

(一九一八年)

“世道浇漓<sup>②</sup>，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sup>③</sup>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sup>④</sup>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sup>⑤</sup>；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sup>⑥</sup>。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sup>⑦</sup>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

征。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sup>⑧</sup>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sup>⑨</sup>，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sup>⑩</sup>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

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账；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sup>⑩</sup>，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戒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



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 所以除出); 一种是不节烈的人; 一种是尚未出嫁, 或丈夫还在, 又未遇见强暴, 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 正蒙表彰, 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 中国从来不许忏悔, 女子做事一错, 补过无及, 只好任其羞杀, 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 只在第三种, 现在一经感化, 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 “倘若将来丈夫死了, 决不再嫁; 遇着强暴, 赶紧自裁!” 试问如此立意, 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 有何关系? 这个缘故, 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 节烈的人, 既经表彰, 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 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 虽然立志极高; 万一丈夫长寿, 天下太平, 他便只好饮恨吞声, 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 略加研究, 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 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 道德这事, 必须普遍, 人人应做, 人人能行, 又于自他两利, 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 不特除开男子, 绝不相干; 就是女子, 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 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sup>⑫</sup>里, 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 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 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 尤为奇怪, 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 烈的第一种, 其实也只是守节, 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 根据全在死活, 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 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 女子还是弱者), 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 父兄丈夫力不能救, 左邻右舍也不帮忙, 于是他就死了; 或者竟受了辱, 仍

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象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sup>⑬</sup>，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

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sup>⑭</sup>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sup>⑮</sup>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sup>⑯</sup>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象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sup>⑰</sup>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sup>⑱</sup>，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sup>⑲</sup>，“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sup>⑳</sup>（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sup>㉑</sup>，甚而至于钱谦益<sup>㉒</sup>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sup>⑳</sup>，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sup>㉑</sup>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sup>㉒</sup>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sup>㉓</sup>。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sup>㉔</sup>，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sup>②</sup>,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

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后由作者编入《坟》。

“节”（丈夫死后不能改嫁）“烈”（遇强暴要自杀）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压迫妇女的毒辣手段。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军阀把持政权，他们纠集了封建顽固势力，大肆鼓吹复古主义。民国初年，军阀政府颁布的“褒扬条例”中，就有“表彰节烈”的条款。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下令各省“尊孔读经”，并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各地封建士绅纷纷组织“孔教会”、“尊孔会”，“节孝坊”、“节烈碑”到处都有；一直到“五四”前后，各报刊、县志上也经常刊载颂扬“节妇”“烈女”的诗文，反对民主革命和民主改革，为封建复辟制造舆论。作者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上对封建势力和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支撑封建礼教的“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抨击。这篇文章，是鲁迅第一篇用白话写的战斗杂文，是他早期反封建斗争的代表著作之一。

② 浇漓，人情卑薄的意思。

③ “进呈御览”，封建时代，臣子或文人把著作献给皇帝，叫做“进呈御览”。

④ 针砭(biān边)，原意为用金针和砭石针刺穴治病，引伸为规戒过失的意思。砭，古代用以刺穴治病的石针。

⑤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一八九八(戊戌)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梁启超等，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倡导变法维新，推行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他却组织保皇党，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曾联络反动军阀，扶植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进行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又在《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了《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两篇文章，攻击“民主共和”，崇扬“虚君共和”(就是把皇帝留着实行共和，意即君主立宪)，反对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主张君主立宪制。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曾作《驳康有为共和平议》表示反对。

陈独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主编《新青年》，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前后为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拼凑反党小集团，形成“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⑥ 一九一七年十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胡言乱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



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予以批驳。

陈百年，即陈大齐，北京大学教授。

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语言文字学家，浙江吴兴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写过一些抨击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文章，并提倡文字改革；“五四”后，逐渐消沉，政治上走向堕落。

刘半农(一八九一——一九三四)，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五四”时期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一九二〇年他往法国巴黎研究语音学，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后期思想倒退，鼓吹复古。

⑦ 《新青年》，“五四”时期进行反封建宣传的主要刊物，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二卷一期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二月，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鲁迅在“五四”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该刊发表的。从一九二〇年九月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六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七月停刊。

⑧ 指袁世凯恢复帝制时期。当时为袁世凯阴谋称帝而组织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作《君政复古论》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出版的《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上，作者因以刺之。

⑨ 自戕(qiāng腔)，自杀。

⑩ 惜夫，“夫”为语气词。

⑪ 阴和阳，是我国古代哲学用来说明物质和人事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带有神秘色彩。阳，主刚，阴，主柔。《春秋繁露·基义》：“妻为阴”；《后汉书·刘瑜传》注：“女，阴物也。”这种解释，含有轻视妇女之意。内，家室的意思。封建社会认为女子只能操持家务，不可参与社会

政治活动。

⑫ 指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的《贞操论》，译文载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该文指出了男女在贞操上的不平等现象，主张贞操不应该作为道德行为一律实行。

⑬ 支离，歧异残缺。

⑭ 业儒，以儒为业的人。封建社会里，崇奉孔子、孟子学说的读书人常常以“业儒”自称，这里专指那些竭力维护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⑮ 宋代道学家程颐著文说：“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⑯ 重适，再嫁之意。

⑰ 元朝皇帝谕旨前每书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话，意即“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用“长生天气力里”（意为“上天”）。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简称徽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徽号，意为“聪明天纵”；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徽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徽号，“杰出”的意思。

⑱ 讳(huì 会)，此处作隐瞒解。封建时代，对帝王将相或尊长的不光彩的事，在文章中应故意不提，称“为尊者讳”。

⑲ 封建时代以科举(封建考试制度)选用官吏，应试及格者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处刑。

⑳ 封建统治阶级称农民起义军和一切反对皇帝的军队为“逆兵”，称自己的军队为“天兵”。

㉑ 封建社会的府县志中常有双烈合传的记载。“七姬墓志”指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因怕其七个妾被夺，逼她们一齐缢死，后七人合葬于苏州，张羽为之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cuò 措，置棺于中称厝)志”。

㉒ 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江

苏常熟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崇祯初官至礼部侍郎，南明福王时又为礼部尚书，清军渡江后首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其为人毫无气节，人多耻之。清朝皇帝，为提倡忠于帝室，乾隆时也将他归入“贰臣传”中，表示轻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⑳ 见《说文》卷十二。这句话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妇女的轻视。

㉑ 指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的志怪小说和杂谈。如清人百一居士作《壶天录》就记有再嫁之妇被前夫索命而死的事；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上有再嫁之妇困穷而死的记载。

㉒ 见《说文》卷八。柔即顺从、温和、不反抗的意思。

㉓ 《论语·述而》篇记有孔子的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即只转述前人的话，自己不作发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正统观念都以此作为信条。“不述而作”即与其相违背，故为大忌。

㉔ 室女，指未嫁之女。明代归有光作《贞女论》，清代汪中作《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俞正燮作《贞女说》，都对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提出异议。

㉕ 旌表，旌(jīng 精)，即表彰的意思。封建社会帝王给所谓忠孝节义的人建坊题额以示表彰，称为旌表。

# 《呐喊》自序<sup>①</sup>

(一九二二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sup>②</sup>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sup>③</sup>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sup>④</sup>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sup>⑤</sup>，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sup>⑥</sup>哭了，这正是情

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sup>⑦</sup>，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sup>⑧</sup>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sup>⑨</sup>，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sup>⑩</sup>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sup>⑪</sup>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sup>⑫</sup>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

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sup>⑬</sup>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sup>⑭</sup>。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sup>⑮</sup>，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sup>⑯</sup>，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sup>⑰</sup>，然而那时仿佛

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sup>⑧</sup>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sup>⑨</sup>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



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 注 释

①《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初版包括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短篇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一九三〇年一月第十三次印刷，由作者自己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此后各版都只有小说十四篇。本篇是鲁迅在这个小说集初版时写的序言。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回顾了自己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从事文艺工作的起因。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十八岁时到南京求学，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渴望冲破封建罗网，使祖国独立富强，人民得到解放。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他到日本学医；但是，现实的教训击破了他医学可以救国的幻想，他决心以文艺为武器，为唤起人民的觉悟而努力。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鲁迅深为失望，他沉重地思考着革命的教训。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鲁迅从沉默中召唤起来，他发出响亮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呐喊。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自己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思想，作了生动的叙述，明确地表示了“听将令”——即接受无产阶级

思想领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立场。

② 质铺,即当铺。

③ 药引,中医处方中,用以引导诸药达到病处的某种药物。

④ 小康人家,有一定资产,能自给自足,生活过得较好者。

⑤ N指南京, 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鲁迅于一八九八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一九〇二年毕业后即赴日本留学。

⑥ 伊,同她。“五四”初期白话文中,第三人称代名词,不论男女或物都用“他”;稍后用“伊”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称物仍用“他”,至后来才有“他”、“她”、“牠”之分。

⑦ 格致,源于“格物致知”,《礼·大学》:“致知在格物”,意即推究事物的道理取得知识。这里是指一门包括物理、化学等知识的学科。

⑧ 清末译成中文的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书。《全体新论》一卷,英国合信著,一八五一年出版;《化学卫生论》四卷,英国真司腾著,一八七九年出版。

⑨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讽刺和揭露了清朝末年绍兴一些乱开药方的庸医,并不是对中国医药学的全盘否定。后来,他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说,《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对我国医学的宝贵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

⑩ 日本维新,即日本明治维新,发生于明治天皇(一八五二——一九一二)统治期间。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通过维新,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权,迅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⑪ 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一九〇四年,鲁迅进该校学医。

⑫ 日俄战争,即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日本和俄国为重新瓜分我国东北和朝鲜在我国东北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结果是日本战胜了俄国。

⑬ 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作者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住在这里。

⑭ 鲁迅当时利用业余时间对中国古代的造象及墓志等金石拓本进行了研究。

⑮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日益和工农运动结合,产生了巨大威力。买办文人胡适于一九一九年发表文章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这里,鲁迅对胡适这种谬论进行了讽刺。

⑯ 指钱玄同,他是那时的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后不久,林琴南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新文化运动,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⑰ 《新青年》,参见《我之节烈观》注①。

⑱ 惮(dàn 旦),畏惧。

⑲ 恤(xù 叙),顾虑,忧虑。不恤,不怕。

# 未有天才之前<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sup>②</sup>，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

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sup>③</sup>。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落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sup>④</sup>。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sup>⑤</sup>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sup>⑥</sup>，定须张三李四才行，

于是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免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后由作者编入《坟》。

五四运动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在文艺界，又出现过“崇拜创作”的倾向。此外还有一些“恶意的批评家”，鼓吹创作需要“天才”。鲁迅在这篇讲演中，揭露了胡适之流诱使青年埋在南窗下读死书的险恶用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鼓吹“天才”的论调，反对对青年的“幼稚”抱扼杀、压制的态度，号召青年甘心做培植花木的“泥土”，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

② Alps 山，即阿尔卑斯山，在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一七六九——一八二一），法国的统帅和皇帝（一八〇四——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在一八〇〇年进兵意大利同俄军作战时，曾经越过此山。

③ 胡适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了鼓吹“整理国故”的活动。一九二三年，他继办《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之后，又创办《国学季刊》，在该刊《发刊宣言》中，系统地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反动主张。他恶毒地说过，他的目的，是使青年们通过“整理国故”知道“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

④ 这里所谈的“崇拜创作”，按作者的意思，是指“排斥外来思想”，憎恶翻译。创造社早期部分人有这种倾向。

⑤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都介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

陀思妥夫斯奇（一八二一——一八八一），通译陀思妥也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以上几位俄国作家，在“五四”前后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们主要作品的翻译，则是以后的事。

⑥ 彼得和约翰，是欧洲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作家。



# 忽然想到<sup>①</sup>

(一九二五年)

## 五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sup>②</sup>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sup>③</sup>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之！”没出息的刘邦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

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sup>④</sup>，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sup>⑤</sup>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 六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sup>⑥</sup>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sup>⑦</sup>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sup>⑧</sup>。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sup>⑨</sup>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sup>⑩</sup>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陌宋<sup>⑪</sup>，潍县陈氏的十钟<sup>⑫</sup>，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

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sup>⑬</sup>，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sup>⑭</sup>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sup>⑮</sup>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sup>⑯</sup>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sup>⑰</sup>，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sup>⑱</sup>，百宋千元<sup>⑲</sup>，天球河图<sup>⑳</sup>，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sup>㉑</sup>，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呢？

四月十八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京报副刊》。后由作者并成一篇，编入《华盖集》。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走向高潮，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行将覆灭的命运，在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里加强统治。遗老遗少们保古、复古的论调，胡适“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都是为配合这种政治形势而制造的“开倒车”舆论。针对这类反革命言论，鲁迅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②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这时刚在北京会试，就集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所谓“公车上书”。按汉朝用公家的车子送应征的人，所以后世举人入京会试，也称“公车”。

③ 秦朝称人民为“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

④ 语见《诗经·大雅·桑柔》篇。意为我生在这不幸的时代。

⑤ 约翰弥耳(一八〇六——一八七三)，通译约翰穆勒，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功利主义》等书。

⑥ 指借考古之名而来我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英、法等国所谓“学者”曾多次以“考古”为名从我国盗走大批古物。一九二四年，美国瓦尔纳在干佛洞以特制胶布粘去壁画二十六幅；一九二五年二月，他又组织了一个所谓“哈佛大学旅行团”，带了大批胶布等材料，企图到干佛洞作更大规模的盗窃，后经敦煌人民反抗，阴谋未能得逞。

⑦ 弱水，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水名。相传弱水“周回绕匝”着中国，“鸿毛不浮，不可越也。”(《十洲记》)

⑧ 语见《诗经·周颂·载芟》篇。意思是不但现在，从古以来就如此了。

⑨ “涅槃”(niè pán 聂盘)，佛教名词，佛教的最高境界，意为寂灭、无为、解脱等等，后来称佛或高僧的死为“涅槃”，引伸用作死亡的意思。

⑩ 劬(qú 渠)，勤劳；劬古就是勤于研究古代文化的意思。

⑪ 陆心源(一八四三——一八九四), 浙江归安(今吴兴)人, 是清朝末年的藏书家。他藏有宋版书二百余种, 所以他的藏书处名为皕(bì 毕)宋楼。在他死后, 这些书都由他的儿子树藩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

⑫ 陈介祺(一八一三——一八八四), 山东潍县人, 是清朝的古文物收藏家。他藏有古代乐器钟十口, 所以他的书斋称为十钟山房。这些钟后来在一九一七年卖给日本财阀住友家。

⑬ 赤子, 初生的婴儿。

⑭ 教会学校, 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通过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⑮ 《四书》, 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必须熟读的书。

⑯ 遗老, 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 忠于旧朝而不愿在新朝作官的人。这里指辛亥革命后, 仍然迷恋清朝, 敌视革命的封建复古主义者。

⑰ 宋朝以来, 有一些儒家学者专从人性、天理两方面阐释孔孟学说, 称为理学, 性理学, 亦称道学。

⑱ 《三坟》、《五典》, 相传是三皇五帝时的遗书, 现已不可考。

⑲ 指清朝藏书家黄丕烈和吴騫的藏书。他们都是乾隆时人。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余种, 他的书室名为“百宋一廛”; 而吴騫则藏有元版书一干部, 他的书室就名为“千元十驾”。这里与《三坟》《五典》都泛指古书。

⑳ 天球, 相传为古雍州(今陕西、甘肃一带地方)所产美玉; 河图, 相传为伏羲时龙马从黄河负出的图。

㉑ 语见《庄子·山木》篇: “林回弃千金之璧, 负赤子而趋。或曰: ‘为其布与? 赤子之布寡矣! 为其累与? 赤子之累多矣! 弃千金之璧, 负赤子而趋, 何也?’ 林回曰: ‘彼以利合, 此以天属也。’” (布是古代的钱币。)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sup>①</sup>

(一九二五年)

## 一 解 题

《语丝》<sup>②</sup>五七期上语堂先生<sup>③</sup>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sup>④</sup>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

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噪，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sup>⑤</sup>，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sup>⑥</sup>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sup>⑦</sup>，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sup>⑧</sup>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



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象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sup>⑨</sup>，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sup>⑩</sup>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sup>⑪</sup>。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sup>⑫</sup>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

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sup>⑬</sup>，中国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sup>⑭</sup>，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sup>⑮</sup>，——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sup>⑯</sup>。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sup>⑰</sup>，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sup>⑱</sup>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里的杨荫榆女士和陈西滢先生<sup>⑲</sup>，真是洪福齐天。

##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是恕道<sup>⑳</sup>，“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sup>㉑</sup>。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

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sup>②</sup>，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sup>③</sup>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sup>④</sup>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

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sup>②5</sup>而已矣。

满心“婆理”<sup>②6</sup>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sup>②7</sup>，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sup>②8</sup>，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sup>②9</sup>，

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sup>⑳</sup>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sup>㉑</sup>。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sup>㉒</sup>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sup>㉓</sup>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sup>㉔</sup>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sup>㉕</sup>，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范大学学生<sup>㉖</sup>，《现代评论》<sup>㉗</sup>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吧？”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

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sup>①</sup>。

## 八 结 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坟》。

“费厄泼赖”(Fair play), 英语, 原为体育运动竞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 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所谓“费厄”就是对对方要宽大, 不要穷追猛打; 所谓“泼赖”就是凡事以游戏态度对待之, 不要过分认真。英国资产阶级有人鼓吹将这种精神运用于政治党派间的斗争和社会生活中, 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所谓“绅士作风”。其实资产阶级压迫和欺骗广大劳动人民一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 毫不“光明正大”。因此, 这类资产阶级绅士们所标榜和宣扬的所谓“费厄泼赖”精神是极端虚伪的, 目的是在掩盖自己的剥削本质, 麻痹革命人民。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北京女师大学生为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女师大风潮”。这场斗争，逐渐扩展到社会上去。“现代评论派”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对进步学生进行了种种诬蔑攻击，军阀政府公然用武力对学生进行迫害和镇压。鲁迅则坚决支持青年们的正义斗争，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及其帮凶。一九二五年底，中国革命出现了高潮，反动校长杨荫榆溜走了，教育总长章士钊下台了，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躲到天津去了。女师大学生的斗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获得初步胜利。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就在这时，挂着“自由主义”招牌、并曾附合鲁迅对“现代评论派”抨击的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在十二月《语丝》第五十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说什么：“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妄图瓦解革命人民的斗志，挽救反动派的灭亡。林语堂此文发表三个月后，段祺瑞就亲手制造了血腥屠杀徒手请愿爱国群众数十人的“三·一八”惨案。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读了当时《国民新报副刊》上译载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若干章节。思想上阶级论因素的出现，使他在斗争中更加勇猛、有力、彻底。在本文中，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说过，这篇文章，“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他以革命的彻底精神，深刻指出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提醒人们记取“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教训。他提出的“痛打落水狗”的重要原则，启示着革命者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② 《语丝》，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迁到上海出版，一九三〇年三月停

刊。鲁迅是《语丝》的发刊人之一，也是重要的撰稿人和支持者，在上海时并一度任编辑。

③ 语堂，即林语堂，福建龙溪人，曾留学美国，一度与鲁迅有交往，后堕落成为买办文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在厦门大学、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等处任职。三十年代在上海提倡小品文，宣扬“闲适”、“性灵”，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效劳。抗战胜利后长住美国。

④ “义角”，即假角。买办资产阶级文人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现代评论》的《闲话》中攻击鲁迅说：“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的缘故。

⑤ 受洗，原意是凡入基督教的人，由牧师用水淋其头或洗其身，以示涤罪，叫受洗。

⑥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即英国百科全书。

⑦ 可掬(jū 居)，可以用双手捧取。这里是说叭儿狗(比喻替反动派当走狗的文人)所显示出来的“不偏不倚”的神情十分鲜明，好象可以用手摸到。

⑧ “中庸之道”，是封建的孔孟儒家哲学所提倡的一种所谓“不偏不倚，中立稳妥”的处世态度。

⑨ 康党，指参加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等要求清政府“变法维新”的人。革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的革命党。

⑩ 清朝官僚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分别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大官是用红珊瑚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⑪ 满族风俗，男人要蓄发留长辫。清朝统治时，迫令汉人也留发梳成辫子。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到处剪辫，有的人怕清朝复辟，不敢剪辫；有些遗老留恋清朝，梦想复辟，不愿剪辫，就将辫子盘在头上，伪装“革



命”了。此处指后一种人。

⑫ 维新，即革新。咸，都。咸与维新，即都参加革新了。这里是说辛亥革命刚推翻清朝，反动势力纷纷挂起“革命”招牌，投机混入革命队伍。

⑬ 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广东、江西、安徽等地革命派军队的讨袁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战争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⑭ 秋瑾(一八七五——一九〇七)，字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因进行革命活动，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被捕，十七日即被杀于绍兴城内轩亭口。

⑮ 都督，民国初年掌握一个地区军政大权的官。

⑯ 王金发，浙江嵊县人，出身绿林，清末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时，他带革命军到绍兴，解散了当地旧官僚士绅匆忙组成的军政府，重新组成新军政府，任绍兴都督。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被解职，寓居上海。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写的《捧与杀》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写的《范爱农》中，都谈到过王金发，指出他的致命弱点：一是胜利冲昏头脑，被“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腐化起来；二是革命不彻底，宽恕敌人，最后反被“落水狗”谋害。

⑰ 谋主，出计谋的主要人物。杀害秋瑾的谋主，指章介眉，当时绍兴的一个大地主。一九〇七年秋瑾起义时，他是浙江巡抚曾敦(yāng 央)手下的幕僚。辛亥革命后，王金发曾将他逮捕，他采取捐献一些田产的手法，不久获释，随即到北京投靠袁世凯，任总统府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总统府命令浙江行政公署归还他以前捐献的田产。不久王

金发被杀害，他也是参与谋划的。

⑱ “寿终正寝”，老年时在家中安然死去的意思。正寝，住房的正屋。

⑲ 杨荫榆，美国留学生，一九二四年被军阀政府委任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反对革命，压迫学生。她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陈西滢都是江苏无锡县人。陈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鲁迅所说的“模范的名城”，即指此。

陈西滢，名陈源，“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原依附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七年后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⑳ 校(jiào 较)，计较。恕，宽恕。别人侵犯你，你不计较，就是恕道。“犯而不校”，出自《论语·泰伯》篇。

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语出《旧约·申命记》，就是别人用什么对付我，我就还他什么；主张反抗、报复。对敌人针锋相对，直来直往，所以是直道。

㉒ 冰山是会溶化的，比喻坏人依靠必然灭亡的势力，放肆作恶，毫无忌惮。

㉓ 矜(jīn 今)，怜惜。哀矜，即哀怜。

㉔ 瓮(wèng)，陶器。“请君入瓮”，是《资治通鉴》上的一个故事。唐朝武则天时，有人告发酷吏周兴谋反，武则天命亲信来俊臣审理这个案件。来宴请周兴，席间问道：“犯人不肯招供，有什么好办法？”周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用一只大瓮，架在炭火上，把犯人放进瓮中，他还能不招吗？”来俊臣于是叫人拿来大瓮，按周兴说的方法把火烧起来，然后对周兴说：皇上叫我审讯你，“请君入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㉕ 党同伐异，指意见、立场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攻击意见、立场不同的人。在鲁迅揭露了“现代评论”派的面目后，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的《闲话》中说，“中国人是

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攻击鲁迅是“党同伐异”，鲁迅在这里也就用这句话来加以反击。一方面为了揭穿陈西滢等人的假面具，一方面坚持正义立场，明确表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妥协。

⑳ “婆理”，对“公理”而言，因反动文人陈西滢等在女师大风潮中，曾组织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打着“公理”的招牌来支持反动女校长杨荫榆镇压学生，所以鲁迅这样讽刺他们。同时，鲁迅在这里用“婆理”，也是暗喻杨荫榆把她和女学生的冲突说成是“与此曹子勃谿相向”，即婆媳吵架，俨然以封建家庭的“婆婆”自居，因此鲁迅说她的理是“婆理”。

㉑ “狡兔三窟”，即狡猾的兔子常为自己准备下三个窝，语出《国策·齐策四》：“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这里说落水狗（暂时下台人物）早已准备了种种退路了，又很会到处钻营谋划，不久又会爬上台去。

㉒ 赫奕，显明、盛大的意思。

㉓ 清流，封建时代负有声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汉的清流，指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当时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的罪恶，因此为宦官所诬陷，说他们“结党危害朝廷”，被朝廷捕杀。明的东林，指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在东林书院以讲学为名，议论朝政，主张改良。有一部分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改良主义政治集团。后被宦官魏忠贤所屠杀。

㉔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宋朝人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中所说的话。意思是：就用他那个人的道理或办法去对付他本人。

㉕ 臻(zhēn针)，达到。邳(zhì至)，极。臻于邳治，即达到把国家治理得极好的地步。

㉖ 笞(chī吃)，竹板子。笞刑，旧时的一种刑法，即打板子。

③ 燧人氏,古代传说中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的人。

④ 尧舜,唐尧、虞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⑤ 孔子的话,见《论语·述而》篇。鲁迅引用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想求得什么便得到什么的人,又有什么抱怨的呢。

⑥ 刘百昭,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这里指一九二五年三月,刘百昭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雇用男女流氓殴打学生,并将学生强拖出校的事件。

⑦ 《现代评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唐有壬等。他们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为靠山,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刊物以政论为主,也刊文艺、文艺评论及其他文章。

⑧ 镖(biāo 标),同镖。保镖,旧时富商或官僚雇用会武术的人来保护自身和财物安全。遗泽,即遗留下来的好东西。章士钊的“遗泽”,指他作教育总长时的爪牙。

# 一点比喻<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闾城<sup>②</sup>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为他是不很读书的，所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只会自己乱打乱割，乱得

哀号之声，洋洋盈耳，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Schopenhauer 先生<sup>③</sup> 曾将绅士们比作豪猪，我想，这实在有些失体统。但在他，自然是并没有什么别的恶意的，不过拉扯来作一个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sup>④</sup> 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

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r distance!”<sup>⑤</sup>

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sup>⑥</sup>。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sup>⑦</sup>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一月二十五日。

## 注 释

①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四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

文章以深刻的比喻，揭露了以胡适、陈西滢为代表的御用文人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的阴险手段，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法律和道德的阶级本质，鼓舞革命人民同反动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② 圍城：圍即合，全城的意思。

③ Schopenhauer, 通译叔本华(一七八八——一八六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一八五一年出版的一本叔本华的杂文集，意思为“副业和补遗”。

⑤ Keep your distance, 英语：“保持你的距离！”

⑥ “礼不下庶人”和后面的“刑不上大夫”都是《礼记·曲礼》中的话，它集中地反映了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法律和道德那种保护反动阶级、压迫下层人民的反动本质。

⑦ 拚(pàn 判)，舍弃。



# 我还不能“带住”<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sup>②</sup>，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sup>③</sup>教授开场白，徐志摩<sup>④</sup>“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说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sup>⑤</sup>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sup>⑥</sup>，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

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纳呀<sup>⑦</sup>，……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sup>⑧</sup>，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浹髓<sup>⑨</sup>，比起法国的勃罗亚<sup>⑩</sup>——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

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上答复了<sup>①</sup>，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sup>②</sup>。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sup>③</sup>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sup>④</sup>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京报副刊》。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反动校方的学潮发生以后，北洋军阀所豢养的一批反动文人，如“现代评论派”中的胡适、陈源、徐志摩等，就在几种反动刊物上，为主子敷脂抹粉，辱骂学生，攻击鲁迅。鲁迅写了《碰壁之后》《忽然想到》《并非闲话》等大量战斗杂文，予以迎头痛击。这些杂文无情地暴露了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和国内反动派忠实代言人的反动嘴脸。陈源、徐志摩等害怕这样下去反动面目将彻底暴露，就公然提出“带住”，妄想自行解围，滑脚溜走。鲁迅发扬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用“我还不能‘带住’”的明确语言，宣告要把战斗进行到底。

②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此外便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当时有署名杨丹初的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问陈源》一文，其中便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周，即周树人，鲁迅的本名。

③ 李四光，字仲揆，著名地质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④ 徐志摩（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浙江硖石人。曾与胡适等创刊《新月》，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流派“新月派”的骨干，公开反对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⑤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徐志摩在信中写道：“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象受教育人不象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⑥ 这是陈西滢诬蔑鲁迅的话，他在《致志摩》信中说：“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⑦ 法兰斯(一八四四——一九二四)，通译法朗士，法国小说家。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中一再大谈法朗士。徐志摩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说：“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朗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

萧伯纳(一八五六——一九五〇)，爱尔兰作家、戏剧家。

⑧ 语出《诗经·小雅·巷伯》篇：“取彼潜人，投畀(bì 币)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意思是：把那些造谣的人，扔到虎狼群里(让虎狼吃掉)；如果虎狼不吃，就扔到太阴之乡(冻死他们)。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在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信中，说要把女师大教职员“投畀豺虎”，李四光是该会的参加者之一。

⑨ 沦肌浹髓，浸透肌肉深入骨髓的意思。这里指中毒之深。

⑩ 勃罗亚(一八四六——一九一七)，法国作家。他常常在文章中用极毒辣的语句攻击当时文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

⑪ 指鲁迅写的《不是信》。该文原发表于《语丝》第六十五期，后收入《华盖集》。

⑫ 这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所载徐志摩著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中的话。原文为：“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 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一八六六——一九四四)，法国作家，巴黎大学音乐史教授。代表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列夫·托尔斯泰传》等。

⑬ 这原是陈西滢的话，他在《致志摩》信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是因为半年来受人攻击而“忍不住的爆发”，“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上了口鼻，还少不了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

⑭ 这原是陈西滢诬蔑女师大风潮的话，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评论女师大风潮的《闲话》中，攻击学生“闹得太不象样了”，说：“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让它酝酿下去，好象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

# 无花的蔷薇之二<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

## 1

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帝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sup>②</sup>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sup>③</sup>，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 2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④（《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 3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⑤。

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 4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⑥。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



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 5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sup>⑦</sup>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sup>⑧</sup>!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sup>⑨</sup>,仅有一点相象。

## 6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sup>⑩</sup>,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 7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sup>⑪</sup>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

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涯……。

## 8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 9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失利，便公开出兵援助奉军，于十二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三月十六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大惨案。鲁迅的这篇文章就是在当天晚上写的。

② 勃尔根，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这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说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报》。

③ 叔梁纥，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所以后文说“生孔子于耶稣之前。”

④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章川岛在《语丝》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说到：“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这两篇通信都揭露了当时《现代评论》收受津贴的事实；对于这两篇通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曾经加以辩解，说他个人并未“每月领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够证明他“领受过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

“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现代评论》。”

⑤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的《闲话》中为章士钊和他所主办的《甲寅》周刊吹嘘说：“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孤桐，即章士钊，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⑥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鲁迅曾以《无花的蔷薇》为题写了一组小杂感。三月十八日，鲁迅续写《无花的蔷薇之二》，才写完三则，段祺瑞屠杀青年的惨案传来，鲁迅立即进行抨击，写下了四至九则杂感，愤怒地控诉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

⑦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皖（安徽）系军阀头子。一九二四年被奉（奉天，即今辽宁）系军阀拥立为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四月下台。一九三六年死于上海。

⑧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政府竟下令通缉徐谦等人，诬蔑当日参加请愿的爱国群众都是“暴徒”。

⑨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国旧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工人被击毙，两千多工人受伤。可萨克，今通译哥萨克。

⑩ 反躬自责，反过来自己责备自己。

⑪ 见《诗经·大雅·抑》篇：“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

# 纪念刘和珍君<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sup>②</sup>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sup>③</sup>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sup>④</sup>，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sup>⑤</sup>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sup>⑥</sup>，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发，就在沈默中灭亡。

沈 沈 沈 沈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沈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沈勇而友爱的张静淑<sup>⑦</sup>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sup>⑧</sup>，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sup>⑨</sup>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sup>⑩</sup>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sup>⑪</sup>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

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

四月一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污蔑被害者是“暴徒”。陈西滢、徐志摩之流散布流言，为段政府帮腔。鲁迅在这一篇文章里深刻揭露了反动统治当局的凶残，痛斥了那些所谓学者文人无耻的谎言和下劣的行为，热情讴歌了青年学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② 刘和珍，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遇害时年廿二岁。杨德群，湖南人，一九二五年由武昌师大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理预科学生，遇害时年廿四岁。

③ 《莽原》周刊，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出至第三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给许广平的信（见《两地书》）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

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④ 长歌当哭，意即以诗或文，发抒哀思，悼念死者。

⑤ 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等。

⑥ 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北洋军阀政府武力占领学校，学生们在鲁迅的支持下于宗帽胡同赁屋坚持上课。偏安，偏居一方以自安。

⑦ 张静淑，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⑧ 绯红，浅红、淡红的意思。

⑨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我国晋朝诗人。这里引用的四句，见他所作的《挽歌》。

⑩ 流言家，专门散布流言蜚语的人。这里指陈西滢之流。

⑪ 殒(yǔn 允)身不恤(xù 序)，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考虑。殒，死亡；恤，考虑。

# 写在《坟》后面<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甚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sup>②</sup>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

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sup>③</sup>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sup>④</sup>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sup>⑤</sup>。虽然自以为放达<sup>⑥</sup>，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sup>⑦</sup>，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

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sup>⑧</sup>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sup>⑨</sup>，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先驱，就有

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掙<sup>⑩</sup>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sup>⑪</sup>。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沈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sup>⑫</sup>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

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sup>⑬</sup>,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sup>⑭</sup>,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



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sup>⑤</sup>，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陵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sup>⑥</sup>，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睇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貽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

鲁迅

## 注 释

① 《坟》，鲁迅的杂文集，包括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三篇作品，初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本篇是作者在厦门写的。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因受到军阀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他说过：“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

备。”鲁迅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战斗历程，思考着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本篇反映了他在实现世界观根本转变前夕不断解剖自己、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勇于和旧事物诀别的思想面貌，表示了他与阶级敌人不妥协地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② 南普陀寺，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七一三——七四一）年间，原名普照寺。

③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曾任建威参军。晋朝的封建名士，以纵酒狂饮著称。

④ 锸（chā插），铁锹。荷锸，扛着铁锹。

⑤ 此事见《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

⑥ 放达，不受礼法拘束，看得很开的意思。

⑦ 指《摩罗诗力说》，其中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八个具有反抗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

⑧ 枭（xiāo 消），一种凶猛的鸟，常在夜间飞行，捕食小动物。

⑨ 矍铄（jué shuò 觉朔），形容老年人精神健旺。

⑩ 掊（pǒu 瓠）击，抨击。

⑪ 指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上有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⑫ 庄周，战国时代的哲学家和散文家，道家思想的代表者。韩非，战国末期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法家思想的代表者。

⑬ 天纵之圣，天生的圣人。

⑭ 指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京报副刊》上的《青年必读书》一文，后收入《华盖集》。

⑮ 《坟》里除收有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所写的白话论文、杂感

十九篇外，还收有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写的文言文论文四篇，所以说“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

⑩ 陆机(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晋朝著名文学家。曹孟德，即曹操。陆机吊曹孟德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皇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衣服）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说曹操在临死时虽然言称“简礼”“薄葬”，但仍然深深地留恋于这些事情，以致落得后世的非议。他因此而表示了无限的感慨。

#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sup>①</sup>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一九二七年)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sup>②</sup>之后,而且又是党锢<sup>③</sup>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sup>④</sup>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sup>⑤</sup>,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sup>⑥</sup>,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

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sup>⑦</sup>，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sup>⑧</sup>，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sup>⑨</sup>。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sup>⑩</sup>。——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sup>⑪</sup>。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sup>⑫</sup>。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sup>⑬</sup>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sup>⑭</sup>。——就

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sup>⑮</sup>。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sup>⑯</sup>，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sup>⑰</sup>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人<sup>⑱</sup>，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sup>⑲</sup>。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sup>⑳</sup>，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sup>㉑</sup>，

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sup>⑳</sup>，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sup>㉑</sup>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sup>㉒</sup>，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sup>㉓</sup>，还有明帝曹叡<sup>㉔</sup>，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sup>㉕</sup>。《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sup>㉖</sup>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sup>㉗</sup>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sup>㉘</sup>。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sup>㉙</sup>；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sup>㉚</sup>，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

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sup>⑳</sup>，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sup>㉑</sup>。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sup>㉒</sup>。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sup>㉓</sup>。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sup>㉔</sup>。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sup>㉕</sup>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sup>㉖</sup>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sup>㉗</sup>。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



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sup>④</sup>，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sup>⑤</sup>。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sup>⑥</sup>。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sup>⑦</sup>。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sup>⑧</sup>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sup>⑨</sup>。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sup>⑩</sup>。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

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sup>④</sup>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

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扞虱而谈”<sup>④</sup>，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扞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sup>⑤</sup>。

到东晋以后<sup>⑥</sup>，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sup>⑦</sup>。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sup>⑧</sup>。——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

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sup>④</sup>——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在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sup>⑤</sup>，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sup>⑥</sup>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sup>⑦</sup>。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sup>⑧</sup>，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sup>⑨</sup>，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

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sup>⑥</sup>。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sup>⑦</sup>。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sup>⑧</sup>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

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sup>⑤</sup>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sup>⑥</sup>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沈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sup>⑦</sup>。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sup>⑧</sup>，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sup>⑨</sup>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sup>⑩</sup>，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sup>⑪</sup>。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

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sup>⑩</sup>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sup>⑪</sup>。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sup>⑫</sup>。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sup>⑬</sup>，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sup>⑭</sup>，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sup>⑮</sup>，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坏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sup>⑯</sup>，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sup>⑰</sup>。在事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sup>⑱</sup>，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sup>⑲</sup>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

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黷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sup>⑧</sup>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sup>⑨</sup>。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sup>⑩</sup>。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



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sup>③</sup>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sup>④</sup>,——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

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sup>⑥</sup>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sup>⑦</sup>。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sup>⑧</sup>。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

政治的<sup>⑧</sup>。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sup>⑨</sup>，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sup>⑩</sup>，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sup>⑪</sup>。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sup>⑫</sup>。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 注 释

① 本文是作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所作的演讲，发表于一九二

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后由作者编入《而已集》。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他作这个演讲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副标题作“九月间”，可能是《北新》半月刊排印时的错误）。

当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鲁迅在广州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无效之后，愤怒地辞去了在中山大学担任的一切职务，继续采取各种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特务、暗探监视着他，反动报纸不断攻击他，鲁迅的处境十分危险。鲁迅这次演讲，是应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之邀去作的，反动当局想借此机会寻找迫害他的把柄。鲁迅在这篇演讲中，不但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以古例今”，对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和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巧妙地作了批判，对蒋介石这个野心家耍弄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和阴谋诡计，作了揭露。鲁迅于一年后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过：“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迺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澧信）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为当时政治斗争服务的锋利的战斗杂文。

文章中提到的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封建王朝；风度，风格 and 态度；此处所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指魏晋时期以曹操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人为代表的风度和诗文。

② 黄巾，指汉朝末年张角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公元一八四年，参加起义的农民共三十余万。起义者皆头裹黄巾，故称黄巾军。

董卓（？——一九二），汉朝末年的一个大军阀。他于一八九年度掉了汉朝原来的皇帝刘辩，而立刘协为皇帝，自任相国。他对人民进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当时汉朝的首都本在洛阳，他于一九〇年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强迫洛阳人民一起迁移，并把洛阳人民的房屋烧毁，又纵容士兵抢掠杀戮，以致人民大量死亡。从洛阳到长安的路上，堆满了

人民的尸体。在他跟其他军阀之间，还一再爆发战争。一九二年，他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被杀死。董卓大乱，即指董卓的残暴统治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乱。

③ 党锢，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官僚如李膺、杜密等，与一批太学生一起反对宦官，宦官遂指称他们相互结党、“诽谤朝廷”；自公元一六六至一七六年，曾多次逮捕“党人”，每次都牵连至数百人。凡被定为“党人”的，即使在释放以后，仍终身“禁锢”（“禁锢”即不准做官）。最后，连“党人”的父亲、儿子、兄弟、学生、故吏（老部下）也都受到免官“禁锢”的处分。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党锢”。

④ 曹操（一五五——二二〇），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汉献帝（刘协）时，官至丞相，封魏王。当时军阀割据，他先后消灭了占据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一些军阀，统一了中原和北方。他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废掉了汉献帝，自己做皇帝，建立了魏王朝，并追尊曹操为武帝，故也称为魏武帝。

⑤ 《三国志演义》，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写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以汉刘为正统，把曹操作为“奸臣”的典型，予以谴责和否定。

⑥ 在旧的传统戏曲中，被当作正面人物的文臣，一般都由老生扮演，曹操被作为“奸臣”的典型，由大花面来扮演。

⑦ 在封建社会里，写历史的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对本朝的统治阶级分子必然要歌功颂德；同时，当时的封建政权也不容许揭露和批判本朝的封建统治者。所以，“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此处所说的“人物”，即指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统治者。封建社会所编写的历史著作，主要记载他们的活动。

⑧ 曹操自汉献帝建安元年（一九六年）起，在汉王朝中开始掌握中央政权；至二二〇年，他的儿子曹丕建立魏王朝；二六五年，魏王朝灭亡。自曹操实际掌握政权至魏灭亡，共六十九年。

⑨ 严可均(一七六二——一八四三),字景文,清代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辑录当时所能找到的、自上古至南北朝的文章,共收集了三五〇二人的作品。三代,指夏朝、商朝、周朝;上古,指三代以前。但此书所收的上古文,全都出于后人假托;三代文中,有些也为后人假托。

⑩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字仲祐,江苏无锡人,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辑录了他所找到的、自汉朝至南北朝的全部诗歌。

⑪ 刘师培(一八八四——一九一九),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朝末年曾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不久就变节而成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的密探;辛亥革命后,又竭力赞助袁世凯恢复帝制。他所著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辛亥革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叙述汉魏之际至南朝的文学情况;书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中辑录了许多关于魏晋时代的文学评论,可作为史料使用。

⑫ 尚刑名,尚,尊崇;刑名,维护封建秩序的刑法。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一贯使用严刑酷法,曹操则除了残酷镇压人民以外,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还运用严酷的刑法来解决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和镇压内部的叛乱。

⑬ 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所引的《魏武故事》。曹操原语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设使,假如;孤,封建时代帝王的自称。

⑭ 清峻,简要严明。清,清楚明白;峻,严密尖锐。因为“尚刑名”,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严刻的作风。这种作风影响到文学上,就成为一种简约严明的文风。

⑮ 通脱,不拘泥。

⑯ 自命清流,自命为清高的人物。

⑰ 倨傲,傲慢。

⑮ 指东汉人范丹。《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写的《后汉书》说：“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遂投钱去。”之，第三人称的代名词；看之，看望她。设食，备饭、办饭。以，由于。姊婿，姊夫。不德，品德不好。追索还之，追赶和找到了他，把钱还他；索，寻求、找的意思。投钱，把钱投掷在地上。去，指范丹于投钱后离去。

⑯ 这是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所下的命令，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所引的王沈《魏书》。原文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大意说：“现在天下是否有道德很高尚的人，还居住在民间而没有被任用；是否还有勇敢、刚强、不顾惜自己、遇到敌人能够拚命作战的人；在小吏中间是否有才能很高、品质特出的人；在那些有着耻辱的名声、被人所耻笑的行为的人中，是否有才能足以担任将军、守令的人；是否有不仁不孝而具有治国和指挥作战的本领的人；你们都要把各自所知道的上述人员举出来，不要有所遗漏。”)

⑰ 见曹操所作的《董逃歌词》。郑康成(一二七——二〇〇)，名玄，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行酒，给别人酌酒。这句说：郑康成在给别人酌酒时，倒在地上死掉了。郑玄只比曹操早死二十年，所以这是“离当时不久的事实”。

⑱ 遗令，临死时所写、遗给后人的命令。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及其他古书，后皆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

⑲ 这是陆机(参看《写在〈坟〉后面》注⑮)所作《吊魏武帝文》中的话，原文见梁萧统所编《文选》卷六十。意思说，曹操的遗令使他在后世的帝王中遗下了污浊的谤语。贻，遗留；尘谤，污浊的谤语。

⑳ 方士，一种自称有道术、能够炼丹药、求神仙的人，实际是一种宣

传迷信思想、利用迷信手段以欺世惑众的人。这种人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曹操把他们搜罗起来，免得他们捣乱。帷幄，军中的帐幕。汉高祖刘邦称赞他的谋士张良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见《汉书·高帝纪》；运筹，犹言出主意），后世因称参谋人员为“帷幄之士”。此处的“帷幄里面”，犹言参谋机关里。

②④ 曹丕（一八七——二二六），即魏文帝，字子桓。他于公元二二〇年废汉献帝而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魏王朝。

②⑤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曹操的第四子，封陈王。

②⑥ 曹叡（ruì 锐）（二〇四——二三九），即魏明帝，字元仲。他是曹丕的儿子，于公元二二六年曹丕死后，即位为皇帝。

②⑦ 《典论》，曹丕写的一部著作，《论文》是《典论》中的一篇。“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皆见于《典论·论文》。赋，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体裁；气，指作家的气质和文章的气势。这两句说：“诗赋要写得华丽”，“文章的优劣，主要是由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气势所决定的”。

②⑧ 类书，一种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是从多种图书中辑录若干门类或各个学科的资料，用一定方法编排而成（通常用分类编排的方法），以供查考、征引。唐宋时期编了不少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在这些类书中，保存了好多现在已经失传的古书的片段。

②⑨ 《文选》，梁代萧统（五〇一——五三一）编辑，选录战国时期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唐朝李善为此书作注，并把全书重新分为六十卷；《典论·论文》在第五十二卷。

③⑩ “为艺术而艺术”，原为法国哲学家库让（一七九二——一八六七）在巴黎大学的讲义中的用语。意思是说，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艺术与政治无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鲁迅一贯反对这种论调。他在这里是说曹丕关于诗赋的见解近于这种观点，是指曹丕与过去传统相悖，提出新的见解，而并不是鲁迅自己赞同这种观点。在本文



将近结束时,他还明确指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⑳ 见曹丕《典论·论文》。原文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声名自传于后。”意思说:文章是有助于治理国家、使人不朽的伟大事业,所以古代作家的声名能够一直流传于后世。

㉑ 见曹植《与杨德祖书》。原文为:“辞赋小道”。辞,是一种与赋相近的文学体裁。辞赋,此处泛指文学作品;小道,犹言小玩意。

㉒ 曹植自己说,他要在政治上“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见《与杨德祖书》)。“永世之业”、“金石之功”,皆指不朽的功业。当曹操在世时,他虽一度为曹操所赞赏,但后来就失宠了;曹操死后,他又一直受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在政治方面不很得意。

㉓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即公元一九六至二一九年。“建安七子”的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璉,东平刘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这七人都是建安时期的文人,故后人又称他们为“建安七子”。

孔融(一五三——二〇八),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县)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大中大夫。

陈琳(一六〇——二一七),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

王粲(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掾属军谋祭酒。

徐幹(一七〇——二一七),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县)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曹丕)文学。

阮瑀(?——二一二),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

应瑒(?——二一七),字德琬,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

刘楨(?——二一七),字公幹,东平(今山东泰安市)人,曾任丞相掾属。

⑳ 见曹丕《典论·论文》：“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在“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他年龄比其他人约长十岁，又最先去世，年辈也不相同；他还不象其他人那样去写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所以后来被曹操借故杀掉。

㉑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虽曾对孔融有所赞美，但又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理不胜词，意谓文词虽美，所说的道理却不行，跟美好的文词不相称。

㉒ 袁氏兄弟，指袁尚、袁谭、袁熙，是当时占据河北一带的军阀，后皆为曹操所破灭。《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邺城为袁氏的老巢，曹操于二〇四年攻破邺城。书，书信。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纣，商代的最后一个君主。妲己，纣所宠幸的妃子。周公，武王的弟弟，名旦。武王于公元前一〇六六年率兵伐纣，纣兵败，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妲己于纣死后也被武王所杀，并无以妲己赐周公的事；孔融特地这样说，是为了讥讽曹操。不悟，没有理解；曹操当时没有识破孔融是在讥讽自己，以为他仅仅是在讲历史，所以就问他这事情出何经典。

㉓ 孔融反对曹操禁酒的事，见《后汉书·孔融传》：“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注中，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等话。

㉔ 见曹操所作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朝人，善于酿酒，此处“杜康”，即借以指酒。

⑳ 曹操处孔融死刑时，在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中，说孔融“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瓠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贍活余人。”见《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所引的孙盛《魏氏春秋》。曹操把孔融的这两个主张作为罪状，也就是指责孔融“不孝”。“父母与人无亲”，父母跟子女没有什么特殊的亲密关系。瓠，盆。“譬若瓠器，寄盛其中”是说，父母好比盆一类的器具，子女则不过是寄放在这类器具中的东西。“宁贍活余人”，宁可帮助其余的人，使他们活下去，而不帮助不贤的父亲。

㉑ 祢衡(一七三——一九八)，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他很有文名，与孔融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曹操因他名气大，虽想杀他，又有所顾忌，就把他送到荆州的一个军阀刘表处；后因侮慢刘表，刘表又把他送到自己的部下江夏太守黄祖处，终于为黄祖所杀。

㉒ 祢衡和孔融的文章都写得气势颇壮，符合曹丕所说“文以气为主”的原则。但祢衡死时，曹丕还只十二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时，孔融也已经死了(《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所以，祢衡和孔融“以气为主”来写文章，早在曹丕的提倡以前。

㉓ 何晏(?——二四九)，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县)人。他是曹操的女婿，后为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志》卷九《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㉔ 《老子》相传为春秋时期老聃所作，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著作。《易经》大约产生于商末周初，是古代卜卦所用的书，但其中包含着哲学思想，所以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

㉕ 魏的末年，大臣司马懿专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又相继掌权，至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废掉了魏的皇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晋王朝，是为晋武帝。司马懿父子在掌权以后，对于魏的皇族及其亲戚，皆加以打击、杀戮。

㉖ 关于何晏抹粉的事，裴松之为《曹爽传》作的注中引鱼豢《魏略》

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裴启所著《语林》却有不同说法：“（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④⑦ 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篇有一则记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

④⑧ 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是一部很有名的医学著作。关于五石散，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④⑨ “扞虱而谈”的事，见《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扞虱而言，旁若无人。”被褐，穿着粗布衣服；诣之，到他那里去。王猛、桓温都是东晋时人。

⑤⑩ 葛洪（约二八三——三六三），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少时学炼丹术；司马睿为丞相时，曾任谏议、参军等职，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授爵关内侯。后携子至广州，在罗浮山炼丹。所著《抱朴子》，分内外二篇。内篇讲“神仙方药”、“养生延年”；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关于服五石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⑤⑪ 晋朝本来建都于洛阳，后因匈奴族的统治阶级率兵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晋王朝遂于公元三一八年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历史上称建都建康以后的晋朝为东晋，以前的为西晋。东晋以后，在南方又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封建王朝，历史上称为“南朝”。此处所说“东晋以后”，即指东晋和南朝时期。

⑤⑫ 《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有一则记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

‘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⑤ 晋礼，晋朝的礼制。在各个封建王朝，都各有一套关于礼教的规定、制度，以维护封建统治；其中也包括关于丧葬的礼制。“居丧之时”，处在父母尊长的丧事期间。“居丧无礼”，在居丧之时违反了礼制的规定。

⑥ 《世说新语·任诞》篇有一则记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说“温酒”便犯讳而哭。

⑦ 王弼(二二六——二四九)，字辅嗣，山阳人，王粲的族孙。曾注《易经》及《老子》。夏侯玄(二〇九——二五四)，字太初，与魏的皇帝有亲戚关系，后为司马师所杀。下文说他为司马懿所杀，系出于误记。

⑧ 正始，魏皇帝曹芳的年号，为公元二四〇至二四八年；曹芳后来被司马师所废黜，历史上称他为废帝。

⑨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是一部记述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言谈轶事的书。其中关于东晋的文人名士，大抵只记载他们的清谈，而很少涉及他们的文章；可见这些人主要是发空论，不善于写文章。

⑩ 解散方，指《解寒食散方》，梁朝徐叔和编，共十三卷；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⑪ 皇甫谧(mì 密)(二一五——二八二)，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县)人。他所作的《高士传》，记述各个朝代“高士”的事迹。他自述吃散之苦的文章，见《晋书·皇甫谧传》中所载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

⑫ 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竹林七贤”又称“竹林名士”，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袁彦伯作《名士传》成”一条下刘注：“阮嗣

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凌仲为竹林名士。”

嵇康(二二三——二六三)，字叔夜，谯国铨(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与魏室通婚，做过中散大夫。崇尚老、庄，长于四言诗及音乐。后因不满现实，为司马昭所杀。

阮籍(二一〇——二六三)，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瑀之子，曾任从事中郎、步兵校尉等官。性喜纵酒，蔑视礼法。《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山涛(二〇五——二八三)，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起初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隐居；司马师执政时出仕，入晋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右仆射等职。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为《庄子》作注。

阮咸，字仲容，阮籍的侄子，放诞不守礼法，善琵琶，历任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

王戎(二三四——三〇五)，字濬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晋惠帝时，任司徒、尚书令。

刘伶，参见《写在〈坟〉后面》注③。

① 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世，以白眼对之。”他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怩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青眼表示赞赏、尊重，白眼表示鄙弃。

② 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送，口不臧否人物。”臧(zāng 脏)，肯定，赞扬；否(pǐ 匹)贬，非议。这句是说，阮籍后来对一切人都不加可否。

③ 见《世说新语·任诞》。原文为：“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裋衣，诸君何为入我’

辉中?’”恒，经常。纵酒，无节制地喝酒。放达，旷达而不受拘束。栋宇，房屋。辉，裤子。何为，为什么。

⑭ “天地解兮六合开……”三句，解，分解。兮，语词，没有具体意义。六合，天、地和东南西北四方。开，分解。古代传说，宇宙本是浑然一体的，后来分解而为天地六合。陨、颓，坠落。腾而上，腾空而上，指成仙。怀，留恋。这三句说，宇宙从浑然一体而分解为天地六合，星辰在陨落，日月每天要落山，一切都在变动之中，我即使能成仙，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⑮ 见《晋书·阮籍传》：“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文帝，指司马昭；武帝，指司马炎。本文说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当是记忆之误。

⑯ 颜延之（三八四——四五六），字延年，南朝宋琅邪临沂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引颜延之注语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大意说：阮籍在混乱的朝廷里做官，经常害怕遭到诽谤、祸患，因此他所写的诗，常常嗟叹于生之忧患；虽然他的原意是在刺讥当世，而其文却很隐晦，后世的人很难根据自己的感情来猜测他的原意，所以只能粗略地理解他的大意，而对于他作品中幽隐的意旨，只能从略了。

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见《论语》。说，同悦。这句话说：学了以后，又时时温习，不是很快乐的事吗？

⑱ 《自然好学论》是张邈写的一篇文章，难，辩难、驳难之意。张邈的论点是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主张一致的，批判《自然好学论》，也就是批判孔丘的这个主张。张邈曾任辽东太守，大约为嵇康的同时代人，或较嵇康稍前。

⑲ 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据《史记·管蔡世家》说，周武王死后，他的儿子成王年幼，周武王的另一个兄弟周公旦辅佐成王，“管

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作乱。”

⑩ 原语见《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本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曾任尚书吏部郎，后来他要推荐嵇康来担任这一职位，嵇康写信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汤，指成汤，他在夏代末年率兵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商朝；武，指周武王，他在商代末年率兵推翻了纣的统治，建立周朝；所以下文说“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指周公旦。孔，指孔子。非、薄，都是不满、轻视的意思。

⑪ 据《晋书·嵇康传》，嵇康是为司马昭所杀；此处说司马懿，当出于误记。

⑫ 祖述，尊崇和效法前人的学说或行为，称为“祖述”。禅让，即传让帝位的意思。相传唐尧自动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虞舜后来又自动把帝位禅让给夏禹。

⑬ 嵇康友人吕安被他哥哥吕巽诬告为不孝，被捕下狱。吕安申诉说，嵇康了解他的情况，可以证明他无罪；嵇康也毅然为他作证。司马昭就乘此机会，硬把二人作为同伙，以不孝罪判处嵇、吕死刑。见《晋书·嵇康传》及《文选》李善注引《魏氏春秋》等书。

⑭ “忠”、“孝”是封建道德中两个最根本的方面，是直接用以维护、巩固封建政权和族权的。“忠”与“孝”本就密切联系着，不能截然分开，但历朝的封建统治者根据他们当时的具体需要，有时侧重于强调“孝”，称为“以孝治天下”（意谓用“孝”来治理天下），有时又侧重于强调“忠”，称为“以忠治天下”。

⑮ 天位，指皇位。曹丕在汉朝末年，强迫汉朝皇帝把皇位让给他；司马炎在魏的末年，也强迫魏的皇帝把皇位让给自己；名义上是汉末和魏末的这两个皇帝自愿“禅让”，其实是曹氏和司马氏的“巧取豪夺”。

⑯ 伦理，封建社会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封建关系，作为“伦理”的主要内容。此处说，阮籍的言论不大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⑰ 裴頠（二六七——三〇〇），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



人。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在思想上都推崇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家老聃、庄周，裴、孙则推崇孔丘。《崇有论》和《老子非大贤论》都反对老、庄，和“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相反。王何，指王弼、何晏。

⑯ 何曾(一九七——二七八)，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何曾要司马昭惩办阮籍，见《晋书·何曾传》。本文说“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当是记忆偶误。

⑰ 礼义，指封建的礼义；陋于知人心，对人的心理状态理解得很差。此处说，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君子”，只会背一些关于礼义的条文，而不善于了解实际情况。语出《庄子·田子方》，原文为“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据《庄子·田子方》的记载，此语是温伯雪子说的；雪子是温伯的字，他是春秋时楚国人。

⑱ 直隶，即河北。

⑲ “总理的信徒”，总理，指孙中山，他在生前是国民党的总理。当时，蒋介石自称为“总理的信徒”。鲁迅在这里，表面上是说“北方”的“军阀”，实际是指蒋介石之流。

⑳ 见《晋书·阮籍传》：“(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谋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仲容，即阮籍兄阮熙的儿子阮咸。

㉑ 钟会(二二五——二六四)，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为司马师兄弟所信任；公元二六二年，被任为镇西将军，次年领兵伐蜀，蜀平后，因谋反被杀。他去见嵇康时，受到冷遇，因此怀恨在心。后来嵇康入狱，他在司马昭面前极力主张把嵇康杀死。他见嵇康受冷遇的事，见《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即打铁)于大树之下，以自贍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

④ 《家诫》见《嵇康集》第十卷。鲁迅所举的这几条原文如下：“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甚，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倘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之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卷八十九本传说他“十岁而孤”。

⑤ 见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师心”，以心为师，心想如何便如何。遣，发。“师心以遣论”，指嵇康不屈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按照自己的心意，无所顾忌地发议论。使，放任，这里是充分发扬的意思。气，气势、气概。命，支配。“使气以命诗”，指阮籍在诗歌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气概，作品很有气势。

⑥ 陶潜（三六五——四二七），晋朝著名诗人，一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彭泽令，故后人也称他为陶彭泽。著有《陶渊明集》。“五四”以后，有许多资产阶级的文学史家称他为“田园诗人”，说他浑身是“静穆”。鲁迅在本文中明确指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后来在另一篇文章《题未定草（七）》中又深刻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⑦ 这是陶潜《饮酒》诗中的句子。东篱，东面的篱笆。悠然，悠闲自在的样子。

⑧ 《陶集》，指陶渊明的文集。《述酒》，陶渊明所写的一首诗。据南宋人汤汉的注释，此诗是写晋恭帝司马德文被杀害的事件的，表现了陶潜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态度。司马德文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东晋大臣刘裕于公元四二〇年废掉晋恭帝，自己做皇帝，建立了宋王朝；并于次

年派人把司马德文杀害。

⑧ 北朝指北魏、北齐、北周。自西晋末年匈奴族的统治阶级占领北方广大地区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也乘机而起，在北方建立了许多国家，彼此相互争斗；至公元三九六年，鲜卑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北魏王朝，并于四三九年统一北方。北魏以后，在北方又相继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王朝。历史上称北方的这三个王朝为北朝，称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为南朝；并称这一时期为南北朝。北朝的起讫时间为公元三九六至五八一年，南朝为四二〇至五八八年。墓志，人死后，把死者的姓名、简历刻在石板上，放在坟墓里，称为墓志（跟放在坟墓前的墓碑不同）。在我国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北朝时期的墓志。

⑨ 意思是在两三个朝代里都做过官。

⑩ 墨子，即墨翟，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他主张“兼爱”，要天下人彼此相爱；这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现存的《墨子》，就是记述他的思想、言行的著作。杨子，指杨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并无著作流传下来，据《孟子·尽心》的记载，杨朱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为我”，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说，如果牺牲自己的一根毛而能使整个天下都得到好处，他也不干）。

⑪ 陶潜的诗文，有好多都提到死，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 答有恒先生<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

有恒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能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sup>②</sup>，我豫定的沈默期间是两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沈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

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sup>③</sup>。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sup>④</sup>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sup>⑤</sup>。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沈，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sup>⑥</sup>。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sup>⑦</sup>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sup>⑧</sup>，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sup>⑨</sup>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被“投诸四裔”<sup>⑩</sup>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sup>⑪</sup>。厦门的天条<sup>⑫</sup>，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sup>⑬</sup>，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

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sup>⑭</sup>。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微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莫斯科的命令”<sup>⑮</sup>，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sup>⑯</sup>。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sup>⑰</sup>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

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会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sup>⑮</sup>，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sup>⑯</sup>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 九，四。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北新》周刊四十九、五十期合刊。后由作者编入《而已集》。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期合刊上,有一篇有恒(姓时,当时是个青年)写的杂感《这时节》。文中说:“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鲁迅先生的‘思想革命!救救孩子!’的精神,都不见于文字中了!”“老实说,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读后,作本文回答。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和“四·一五”事变之后,鲁迅陷入了极度的悲愤和深沉的苦闷之中。鲁迅对血染双手的国民党反动派切齿憎恨;同时,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鲜明的阶级阵线的划分,使鲁迅觉得以前支持他前进的进化论思想彻底破灭了。鲁迅不留情面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在本文中,他叙述了对自己过去战斗道路和斗争效果的重新认识,对阶级敌人的重新认识,对旧的思想武器和革命领导力量的重新认识。他的思想已开始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离了革命,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落荒、动摇、颓唐,而鲁迅则通过这篇文章公开宣告自己向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迈出坚实的步伐。

② 指一九二六年夏。这年六月十七日鲁迅在给李秉中信中曾说:“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不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③ 殄(tiǎn 舔),灭绝、绝尽。暴殄天物,指任意糟蹋、毁灭物品。

④ 指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的手段。

⑤ 参看鲁迅杂文集《坟》中的《灯下漫笔》。

⑥ 即《辞“大义”》（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后编入《而已集》），文中对陈源之流进行了嘲讽和批判。

⑦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刀笔吏”。

⑧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鲁迅在和李小峰的《通信》（见《而已集》）中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对革命青年的迫害，说：“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了《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⑨ 一九一六年，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后来这一派的政客便被称为“研究系”。“现代派”，指《现代评论》陈西滢之流。

⑩ 裔(yì)，边远之地。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

⑪ 一个教授，指顾颉刚，是现代评论派的成员之一。在厦门大学时曾排斥鲁迅，攻击鲁迅是“名士派”。

⑫ 天条，天帝规定的条例禁令。这里指厦门大学的种种等级森严的规定。

⑬ 《春秋》，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文字简短，相传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之意，后称含褒贬深意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⑭ “身心交病”是狂飙社中坚分子高长虹嘲骂鲁迅的话。高长虹对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进行嘲骂说，在“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按指女师大学生）……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⑮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一种黄色小报《晶报》登载《现代评论被收买？》新闻一则。其中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

津贴一事，（参看《无花的蔷薇之二》注④）唐有壬便写信给《晶报》为《现代评论》辩解，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晶报》在发表这封信的按语中称唐为“《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顽固的亲日反共分子。

⑯“抚哭叛徒的吊客”是《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中的话。鲁迅在文中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里说的“叛徒”，是指背叛反动统治阶级的人。鲁迅还批评了那种“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思想和行为。

⑰“救救孩子”是鲁迅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话。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里是指鲁迅经过“四·一二”血的教训，严格解剖自己，批判过去的进化论思想。

⑱ 吴稚晖（一八六六——一九五三），国民党党棍。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六年二月他曾在书信中说过“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他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呈文，叫嚣什么“打倒”“严办”，主张血腥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

⑲“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悼念被难者，号召革命群众继续斗争，于四月八日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后编入《野草》。

# 文艺与革命<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评家，因此也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至少，在现在的上海滩上。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不过近来的批评家，似乎很怕这两个字，只想在文学上成仙。

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sup>②</sup>。

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

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肠的。

别的此刻不谈。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sup>③</sup>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sup>④</sup>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sup>⑤</sup>，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

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sup>⑥</sup>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四月四日。鲁迅。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六期。后由作者编入《三闲集》。

本文是鲁迅写给冬芬（即董秋芳，当时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回信（《三闲集》中原附有冬芬的来信，本书略）。鲁迅这封回信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文艺与革命、文艺与宣传、文艺的内容与形

式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着重批判了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在文艺理论和创作中的错误倾向,也对梁实秋一类买办文人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抨击。

②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即天主教教士、封建贵族、平民。据此,后来称新兴的无产阶级为第四阶级。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③ 黄巢,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山东曹县人。

④ 辛克来儿,通译辛克莱,美国作家。鲁迅所引的是他在《拜金艺术》一书中的论点。

⑤ “稻香村”,当时著名的糖食店;“陆稿荐”,当时著名的酱肉店。二店都原在苏州,后来迁至上海。上海的商人为了招引顾客,纷纷挂出这种牌号,甚至对门对户牌号相同,各自都以“真”、“老”相标榜。鲁迅用这种商人的投机取巧手段,讽刺了一些“革命文学家”只顾挂招牌而不务实际的错误。

⑥ 指冯乃超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第一号的剧本《同在黑暗的路上走》。

# 铲共大观<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sup>②</sup>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sup>③</sup>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



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sup>④</sup>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sup>⑤</sup>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沈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sup>⑥</sup>，清末党狱<sup>⑦</sup>，民二<sup>⑧</sup>，去年和今年<sup>⑨</sup>，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四月十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后由作者编入《三闲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本文中，鲁迅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集团的滔天罪行，并坚定地表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鼓舞人民不要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②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死难烈士葬广州市郊黄花岗。辛亥革命以后，以起义之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俗称黄花节。

③ 郭亮（一九〇一——一九二八），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十九日在长沙遭杀害。

④ 罗喀绥夫斯奇，俄国文学批评家。

⑤ 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

⑥ “拳匪”，反动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诬蔑。

⑦ 指清朝末年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秋瑾、徐锡麟等人的迫害。

⑧ 参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⑬。

⑨ 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

#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sup>①</sup>

(一九二九年)

新月社<sup>②</sup>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sup>③</sup>,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sup>④</sup>。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sup>⑤</sup>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

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sup>⑥</sup>，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足于两种现状了罢。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一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三闲集》。

② 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们从原来依附北洋军阀转为向蒋介石卖身投靠，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新月社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开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一九二八年三月又创办《新月》月刊，由徐志摩以及陶孟侃、闻一多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和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文学运动。出满一卷后，闻一多辞去编辑职务，从一九二九年四月，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又加入编辑部，并且在文学之外，大谈政治；从一九二九年六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起，由梁实秋一人主编；胡适一直是《新月》的实际主持人。在鲁迅为首的斗争的左翼文艺运动打击下，《新月》声名狼藉，一九三三年六月无声无息地停刊了。

③ 一九二九年十月，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的“零星”栏内发表《“不满足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攻击鲁迅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足于现状’，……好象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④ 这里是讽刺和揭露“新月派”一伙言行的矛盾：他们一面反对“嘲

骂”，一面又嘲骂鲁迅；一面反对不满现状，一面又不满“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这样一种“现状”，这完全是自打嘴巴。

⑤ 皂隶，旧社会衙门里的差役。

⑥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加强法西斯镇压曾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这里讲的“别一种”，指伪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二九年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

#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sup>②</sup>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sup>③</sup>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sup>④</sup>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仿句<sup>⑤</sup>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sup>⑥</sup>，在论文里，也似

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sup>⑦</sup>；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sup>⑧</sup> 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sup>⑨</sup>，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sup>⑩</sup>，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

Chemie译作“舍密学”<sup>⑪</sup>，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sup>⑫</sup>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



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sup>⑬</sup>,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sup>⑭</sup>。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sup>⑮</sup>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 ABCD 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sup>⑯</sup>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象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

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已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sup>⑰</sup>不同于《书经》<sup>⑱</sup>，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sup>⑲</sup>，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sup>⑳</sup>。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sup>㉑</sup>，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sup>㉒</sup>里，专读《古文观止》<sup>㉓</sup>的学者们，看起来

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糊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夫斯基，蒲力汗诺夫”<sup>②④</sup>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sup>②⑤</sup>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sup>②⑥</sup>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糊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思牛克斯”<sup>②⑦</sup>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sup>②⑧</sup>，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思”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

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sup>28</sup>,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sup>29</sup>说地体运动,达尔文<sup>30</sup>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sup>31</sup>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

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

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sup>③</sup>。“汽笛呀！”“列宁呀！”<sup>④</sup>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sup>⑤</sup>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sup>⑥</sup>，志行吐属<sup>⑦</sup>，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

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通俗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歌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歌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



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sup>⑧</sup>。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sup>⑨</sup>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珂德》，法兑耶夫的《溃灭》<sup>④</sup>，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sup>⑤</sup>，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sup>⑥</sup>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sup>⑦</sup>，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

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sup>④</sup>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

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sup>⑤</sup>，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sup>⑥</sup>；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sup>⑦</sup>。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sup>⑧</sup>，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sup>⑨</sup>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sup>⑩</sup>，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 Hauptmann 和 Gregory 夫人<sup>⑪</sup>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

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sup>⑫</sup>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sup>⑬</sup>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sup>⑭</sup>。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sup>⑮</sup>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sup>⑯</sup>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慈<sup>⑰</sup>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sup>⑱</sup>。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

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sup>⑤</sup>，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sup>⑥</sup>，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象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sup>⑦</sup>，但于骂人者则骂

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sup>②</sup>，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sup>③</sup>，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新月》月刊发表了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篇文章。前文仇视鲁迅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后文反对文学的阶级性，主张文学表现所谓的“人

性”。在本文中，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深刻、系统地批判了“新月派”鼓吹的人性论，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② 这是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的《敬告读者》中的话：“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这是欺人之谈。实际上新月派一伙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只准许资产阶级有言论自由，而不准许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言论自由。

③ 梁实秋，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买办资产阶级的新月派的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在中国一贯宣传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思想，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④ 《文艺与批评》，鲁迅翻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的文艺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出版。

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九七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一九〇三年开始，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曾接近马赫派，十月革命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他写过很多文艺论文，观点上曾有唯心主义倾向。

⑤ 仵(lè 勒)句，语法术语，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从前常称“子句”，现在多称主谓词组。

⑥ 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创刊号上曾刊有《“新月”的态度》一文，声称“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本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学艺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⑦ 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中曾刊有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等，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帮忙的文章。

⑧ 英语“无产阶级”。

⑨ 《韦白斯特大字典》，当时美国流行的有名的大字典。以编辑人诺·韦白斯特（一七五八——一八四三）命名。



⑩ 罗马时代，一般指公元前二七——公元二八四年罗马帝国时期。

⑪ “舍密学”，是古法语 *Chemie* 的音译，来源于阿拉伯语，意为“炼金术”，现代化学来源于炼金术，所以今译为化学。

⑫ 梁实秋的“梁”字又作“桥梁”解。

⑬ 优生学，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它把剥削制度下的阶级不平等胡说成人或人种在生理上和智力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则是由他们不同的遗传本性决定的。

⑭ 白璧德(一八六五——一九三三)，美国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提倡反动的“新人文主义”，即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著有《卢梭和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⑮ 杨妃，即杨贵妃，唐明皇的宠妃；岁寒三友即松、竹、梅。

⑯ 《搬家》，凌叔华的短篇小说。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合刊。凌叔华是陈西滢的妻子。

⑰ 《史》《汉》，就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都是古代史书。

⑱ 《书经》，又名《尚书》，上古史料书。

⑲ 我国自东汉末年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朝这项翻译工作有新的发展，当时由玄奘主持在长安弘福寺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上谕，一般指旧时皇帝的诏令。元朝规定皇帝诏令、朝臣奏章、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附以汉文的译文。唐译佛经，元译上谕，这两种译文多为直译，所以有些文句还保存了原文的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译音，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一些影响。

⑳ 见《论语·述而》篇。意即在我看来好象浮云一般。

㉑ 厨川白村(一八八〇——一九二三)，日本文艺评论家。《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集。

⑳ 三家村,泛指人口稀少的偏僻小村。

㉑ 《古文观止》,是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的一部由先秦到明代的文选,以散文为主,选文二百二十二篇,共十二卷。

㉒ 蒲力汗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通译普列汉诺夫,原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来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早期曾用唯物主义观点写过论述原始艺术的著作,鲁迅译过他的《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合为《艺术论》。

㉓ 婆格达诺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通译波格丹诺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全面批判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

㉔ 托罗兹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通译托洛茨基,列宁主义的死敌,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一九〇三年起,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七年八月混入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一九二六年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以两面派手法,进行反党分裂活动,蜕化为反革命匪帮。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联共(布)党,后又进行叛国活动,而于一九二九年被逐出境外。一九四〇年死于墨西哥。

㉕ 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客吴稚晖的反革命谬论。

㉖ 喙(huì会),鸟兽的嘴。万喙息响,万张嘴都不出声了。

㉗ 梁实秋这段话和以下所引梁文,均见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

㉘ 格里莱阿(一五六四——一六四二),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首先证实了地球绕太阳运行,打破了地球中心说。

㉙ 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一八五九年出版的代表作《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

的进化学说，不仅说明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释，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

⑳ 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文学家。

㉑ 《红楼梦》里面贾府的仆人焦大和贵族小姐林黛玉是不同阶级的人，不会相爱。

㉒ 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嚷叫：“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阶级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

㉓ 托尔斯泰，参见《未有天才之前》注⑤。

㉔ 约翰孙(一七〇九——一七八四)，英国文学家。父亲是书商，家境贫困，曾独立编纂第一部《英语词典》。

㉕ 志行，志向和操行。吐属，言谈行动。

㉖ 钱杏邨，又名阿英，太阳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出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文，他曲解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而为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辩护说：“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

《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主编，一九三〇年一月创刊。“左联”成立后，为机关刊物之一。出至第五期停刊。

㉗ 台明·培特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一九一一年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诗作，一九一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㉘ 法兑耶夫(一九〇一——一九五六)，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一九一八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三九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所作《溃灭》通译《毁灭》，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游击队同反革命匪帮进行斗争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出版。一九三〇年，鲁迅曾将此书翻译

成中文。

④① 格拉特珂夫(一八八三——一九五八),苏联作家。他所作《水门汀》,通译《士敏土》或《水泥》。

④② “布尔乔亚”,法语“资产阶级”的音译。

④③ 亚历舍·托尔斯泰(一八八三——一九四五),威垒赛耶夫(一八六七——一九四五),普理希文(一八七四——一九五四),都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前已有一定影响,十月革命后仍继续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

④④ 这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而提出的欺骗口号。

④⑤ 腠(còu)理,是肌肤上的脉理;不中腠理,即未能对准肌肤上的脉理来解剖。引申为没有击中要害的意思。

④⑥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刊有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诬蔑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说鲁迅“和西滢长虹战”是“猩猩和猩猩战”。

④⑦ 鲁迅在《革命咖啡店》(见《三闲集》)中曾提到:“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战线》,周刊,一九二八年四月创刊,至第五期停刊。

④⑧ 烹饪法,烧煮食物的方法。

④⑨ 通译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相传他从希腊大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被宙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老鹰吃他的肝,在白天吃掉多少,到了夜里这一部分又重新长上。

⑤① 《文艺政策》,鲁迅译、编,包括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文艺政策的几个文件和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的决议。

⑤② 郑伯奇,创造社成员。Hauptmann,即霍普特曼(一八六二——一九四六),德国反动戏剧家。Gregory夫人(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即格列高里夫人,英国戏剧家。

⑤③ 鲁迅译过两种《艺术论》。一是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美学论文,

一九二九年四月译成，同年六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一是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译成，一九三〇年七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⑤③ 输诚，即投降。

⑤④ 这是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中诬蔑鲁迅的话。

⑤⑤ 片冈铁兵，日本作家，一九二四年曾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六年后一度标榜转向进步文艺。

⑤⑥ 《申报》，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

⑤⑦ 蒋光慈，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原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鲁迅曾讽刺地称他为“蒋光X”，“X”是未知数；现又讽刺他是“蒋光Z”，也是未知数。就是说，不知变成蒋光什么了。

⑤⑧ 藏原惟人，日本文艺理论家。

⑤⑨ 《一周间》，苏联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

⑥① 尼采(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⑥② 指新月社在《新月》月刊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的“健康”和“尊严”“两大原则”来攻击当时的革命和进步的思想。

⑥③ 一九二九年十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胡适作《人权与约法》，议决教育部对他“加以警诫”。

⑥④ 罗隆基作，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是一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小骂大帮忙的文章。罗隆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客，一九五七年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sup>②</sup>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sup>③</sup>，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sup>④</sup>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因是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sup>⑤</sup>，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sup>⑥</sup>，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

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sup>①</sup>，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sup>②</sup>，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社会杂观”栏。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当时文学批评上一些极“左”倾向的抨击,对那些貌似彻底的假革命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②“大同世界”,过去儒家为维护礼治而宣扬的理想社会。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社会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曾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存在着阶级压迫、存在着私有制的社会环境中,这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③叶永蓁,又名叶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黄埔军校的一个学生;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个师长。《小小十年》是他的一部小说,一九二九年七月,鲁迅曾为此书作过一篇“小引”(收入《三闲集》)。

④乌托邦,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意即“乌(无)有之乡”。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汤姆士·莫尔写过以“乌托邦”为名的小说,描述一种小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一词后来成为“空想”的同义语。

⑤饕餮(tāo tiè 滔帖),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通常用来比喻贪食的人。饜(yàn 厌),吃饱。肥甘,肥美的食品。“饕餮者饜足了肥甘”就是贪吃的人吃腻了肥美的食物。

⑥波特莱尔(一八二一——一八六七),法国资产阶级颓废诗人。他惯于从病态的事物中寻找题材,作品中充满悲观厌世、憎恶革命的情绪。代表作有诗集《恶之花》。

⑦互助说,亦称互助论,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所鼓吹的一种反动理论。认为生物界的规律是互助,不是生存竞争,用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则认为人的本性是互助,抹杀人的阶级性,否定阶级斗争。争存说,亦称生存竞争说,即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倡导的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界进化的规律。

⑧“允执厥中”,语见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sup>①</sup>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一九三〇年)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 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sup>②</sup>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sup>③</sup>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sup>④</sup>，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sup>⑤</sup>和爱伦堡<sup>⑥</sup>，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sup>⑦</sup>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sup>⑧</sup>，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sup>⑨</sup>。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

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

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sup>⑩</sup>，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sup>⑪</sup>。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

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sup>②</sup>，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象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sup>③</sup>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sup>④</sup>，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象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四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六年初，周扬一伙为了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在“左联”内部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周扬、夏衍一伙，在政治上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以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作指导，形成一条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另一方面，鲁迅是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光辉代表。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同周扬一伙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篇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战斗檄文，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文献。

② 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的独裁者，法西斯党头子。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意大利拥护法西斯主义的作家。

③ 浪漫谛克，Romantic的译音，意为“浪漫的”。

④ 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俄国诗人。曾参加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意象派；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但又不愿意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不久陷入了苦闷，一九二五年自杀。

⑤ 毕力涅克(一八九四——?)，通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十月革命后，他虽在政治上接近革命，但并未摆脱文学创作上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⑥ 爱伦堡(一八九一——一九六七)，原是俄国资产阶级作家。十月革命后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赫

鲁晓夫上台后,爱伦堡追随苏修叛徒集团,攻击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鼓吹修正主义文艺的急先锋。

⑦ 南社,一九〇八年成立的文学团体,社员们用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社员中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段祺瑞的安福系、梁启超的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坚持进步的只是少数人,该社就无形中解体。

⑧ 汉官威仪,原指汉朝叔孙通等人所订立的礼仪制度。这里是指某些反清革命者的一种复古思想,他们希望在推翻清朝统治以后,恢复汉族统治的一些封建制度。

⑨ 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的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八首小诗,内容略有出入:

“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  
昂然地在天堂高坐,  
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  
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

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  
和天使们一起欢宴,  
我享受着这些珍品,  
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

⑩ 指当时“左联”刊物《萌芽》、《拓荒者》等。

⑪ “空城计”,见明罗贯中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写的是蜀军师诸葛亮以一座空城计退魏将司马懿十五万大军的故事。

⑫ 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文艺团体。



⑬ 封建科举时代考上了秀才,称为进学。

⑭ “起承转合”是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 “好政府主义”<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sup>②</sup>，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

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〇,四,十七。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五期“社会杂观”栏,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好人政府”最早是胡适在一九二二年为反动统治集团出谋划策,

反对革命而提出的反动口号。一九三〇年胡适、梁实秋之流又在《新月》月刊上老调重弹，目的是博取蒋介石的欢心，让他们参加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本文中，鲁迅对“新月派”的反动政治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

② 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梁实秋的话，均见一九二九年十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零星”栏《“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

#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sup>②</sup>，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sup>③</sup>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sup>④</sup>，“觉得我自己便有点象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贖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

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象“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sup>⑤</sup>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sup>⑥</sup>，《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sup>⑦</sup>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榜”，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

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〇，四，十九。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社会杂观”栏。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等配合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极力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深刻而生动地刻画出梁实秋之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丑恶嘴脸，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② 梁实秋曾经说：“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据此，冯乃超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拓荒者》第二期《文艺理论讲座》一文中批评他说：“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说教的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

③ 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④ 见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不依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他们的幸福，痛苦，以至他们的生死，即他们整个生存，是受劳动之需要的程度如何，因而受生意的发达或清淡及无限制的竞争的动摇所操纵的。”

⑤ 《答鲁迅先生》，也见《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

⑥ 指“三·一八”惨案。

⑦ “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一九三〇年二月在上海成立的进步团体，它的目的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之一。



#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sup>①</sup>

——为美国《新群众》作——

(一九三一年)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艺术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介绍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卢那卡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 Prof. Irving Babbitt)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sup>②</sup>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

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 Serafimovitch)，伊凡诺夫(V. Ivanov)和奥格涅夫(N. 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A. Chekhov)和安特来夫(L. Andreev)③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 Cat和Miss Rose④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⑤(H. Zur Mühl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⑥，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

单是禁止，还不是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⑦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尔特(Oscar Wilde)⑧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

这书店便象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sup>⑨</sup>，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 Förd)<sup>⑩</sup>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艺术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sup>⑪</sup>的个个好象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

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象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命运，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 注 释

① 本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之约，为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而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空前残酷。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逮捕、杀害革命作家，破坏左翼文艺运动，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中国文艺界这种黑暗状况，鲁迅通过本文给予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② “白璧德先生的门徒”、“感觉敏锐的‘学者’”，都指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梁实秋。

③ 绥拉菲摩维支(一八六三——一九四九)，通译绥拉菲摩维奇，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伊凡诺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甲列车第14—69号》。

奥格涅夫，苏联作家，著有《新俄学生日记》。

契诃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俄国小说家。

安特莱夫(一八七一——一九一九)，俄国作家，著有《红笑》等。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

④ 英文，即猫先生和玫瑰小姐。Mr. 是英语“先生”的缩写。

⑤ 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一八八三——一九五一)，德国籍匈牙利女作家，著有童话集《小彼得》、《玫瑰花》、《真理的城》等。

⑥ 指当时湖南军阀何键。他曾禁止在当时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说出人类的话。

⑦ 五个左翼作家，即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和冯铿。

柔石，一九〇一年生，原名赵平复，浙江台州宁海县人，小说家。曾与鲁迅一起组织“朝花社”，“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之一，“左联”执行

委员和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

白莽，一九〇九年生，原名徐白，即殷夫，浙江象山人，诗人。曾任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编辑。

胡也频，一九〇五年生，福建福州人，小说家。“左联”执行委员和工农兵通信委员会主席。

李伟森，一九〇三年生，名求实，湖北金口人。原任党的河南地委书记，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以及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

冯铿(女)，一九〇七年生，又名岑梅，广东潮州人。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左联”成员。

⑧ 斯蒂文生(一八五〇——一八九四)，英国小说家。槐尔特(一八五六——一九〇〇)，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⑨ “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指朱应鹏，他是伪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伪上海市政府委员，《前锋》月刊主编；“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指范争波，他是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前锋》周刊主编。他们都是当时上海的文化特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发起人。

⑩ 亨利·福特，美国垄断资本家，汽车大王。

⑪ 毕亚兹莱(一八七二——一八九六)，英国画家，作品多描绘当时资本主义病态生活。

# 上海文艺之一瞥<sup>①</sup>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一九三一年)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sup>②</sup>。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sup>③</sup>,做八股<sup>④</sup>,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sup>⑤</sup>,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sup>⑥</sup>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sup>⑦</sup>,后来有怕犯讳<sup>⑧</sup>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sup>⑨</sup>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sup>⑩</sup>,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sup>⑪</sup>。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象《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象贾宝玉<sup>⑫</sup>；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sup>⑬</sup>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sup>⑭</sup>，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sup>⑮</sup>，《三宝太监西洋记》<sup>⑯</sup>，《快心编》<sup>⑰</sup>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sup>⑱</sup>，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



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sup>①</sup>——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sup>②</sup>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风先生<sup>③</sup>，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sup>④</sup>（Ukiyoe）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个颓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sup>⑤</sup>，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sup>⑥</sup>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sup>②⑤</sup> (H. R. Haggard: 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意见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sup>②⑥</sup>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sup>②⑦</sup>的剧本的介绍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sup>②⑧</sup>的别一形式的出现，

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sup>⑳</sup>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sup>㉑</sup> (Nora) 似的跑掉了。

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sup>㉒</sup>。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sup>㉓</sup>。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 Yes, No<sup>㉔</sup>，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宓<sup>㉕</sup>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蝴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sup>㉖</sup>，去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

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sup>⑥</sup>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眯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sup>⑦</sup>。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

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sup>⑧</sup>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象两只靠近的

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sup>③⑨</sup> (I. A. Gontcharov) 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风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sup>④⑩</sup>，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sup>④⑪</sup>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象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

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 A 要变 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 B。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象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荡，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 Kuriyak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

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sup>④</sup>，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sup>⑤</sup>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



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得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在一部旧的笔记小说——我忘了它的书名了——上，曾经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朝有一个武官叫说书人讲故事，他便对他讲檀道济<sup>④</sup>——晋朝的一个将军，讲完之后，那武官就吩咐

打说书人一顿，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道：“他既然对我讲檀道济，那么，对檀道济是一定去讲我的了。”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象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sup>④</sup>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sup>⑤</sup>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

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and 八月三日《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后经作者修改，编入《二心集》。按演讲日期，据《鲁迅日记》应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这里副标题所记八月十二日，有误。

《文艺新闻》，周刊，“左联”外围刊物，一九三一年三月创刊，出至一百二十余期停刊。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对鲁迅进行了错误的攻击。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及其他一些投机分子，相继混入文艺界，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宗派活动；“左联”成立之后，他们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分裂和破坏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在本文中，着重对大革命失败后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批判了那些脚踏两只船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

投机性，批判了当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的形“左”实右倾向，剖析了“四条汉子”等投机分子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唤起人们注意防备混进革命队伍的三翻四复的“暗探”，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了解敌人，与革命共同着生命。

② 《申报》，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⑤。清朝末年，《申报》开始刊载一些诗词小说之类的作品。

③ 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四书，参见《忽然想到(五至六)》注⑬。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始称于汉武帝时，长期以来成为宣扬封建宗法思想的理论根据。

④ 八股，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形式死板、内容空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限于《四书》，内容限于朱熹作的《四书集注》，不准作者自由发挥。这种文章，是封建王朝控制知识分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也是读书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⑤ 《红楼梦》，我国著名的长篇古典小说，又名《石头记》、《金玉缘》。清代曹雪芹(?——一七六三)著，共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红楼梦》长期来被封建卫道者诋毁为“诲淫之书”。

⑥ 古体诗和近体诗是我国旧诗中的两大类型。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形成于汉魏六朝，每首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用韵也较自由；近体诗也称今体诗，形成于唐代，分律诗、绝句两种，除排律外，句数、字数一定，平仄、用韵、对仗也要求严格。过去以八股取士，考试时不用诗。

⑦ 封建社会时称外国人为“夷人”，所以后来也称外国人的租界(“洋场”)为“夷场”。

⑧ 讳(huì会)，避忌，忌讳。因为称“洋”为“夷”含有轻蔑的意思，反动统治者怕触犯帝国主义，故将“夷”改为同音字“彝”。

⑨ 旷(kuàng矿)，开朗，空阔之意。旷达，旧谓开朗达观，不计名位，

只求自适其志。一些旧文人常以“旷达”相标榜，寻欢作乐。

⑩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见《论语·公冶长》篇。桴(fú 浮)，木排，这句话大意是，如果自己理想不能实现，就乘木筏飘海出国。

⑪ 迂(yū 愚)，拘泥固执，迂腐守旧。

⑫ 贾宝玉，《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

⑬ 坎坷(kǎn kě 砍可)，不平，屡遭磨难。轲，同坷。

⑭ 灯谜，谜语的一种。谜底多着眼于文字意义，如一个字、一句诗、一种名称等，有谜格二十四种。旧时文人常以此作文字游戏。

⑮ 《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所著的一部讽刺科举制度的长篇小说，五十五回。

⑯ 《三宝太监西洋记》，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代罗懋登著的长篇神魔小说，共二十卷，一百回。

⑰ 《快心编》，清末的一部通俗小说，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橘居士评点，共三集。

⑱ 《点石斋画报》，中国早期石印画报之一，旬刊，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创办，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停刊，每期八幅；最初随《申报》发行，由申报馆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部分作品反映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社会黑暗，但也有一些宣扬了迷信、封建礼教和低级趣味。

⑲ “时务”即时事的意思。

⑳ 绣像，原为绣成的佛像和人像。明清以来，一般通俗小说前面往往绘有书中人物的画像，也称为绣像。

㉑ 叶灵凤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在上海与潘汉年合办《幻洲》，鼓吹“新流氓主义”，他画的封面和插图，多模仿英国颓废派画家毕亚兹莱。

㉒ “浮世绘”，日本德川时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最初以墨色印刷，称“墨折绘”；以后发展为“丹绘”、“红折

绘”、“锦绘”等多色表现形式。十八世纪末期起逐渐衰落。

⑳ 普罗列塔利亚，英语“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音译。

㉑ 这些都是流氓行为：“拆梢”即敲诈，“吊膀子”即勾引妇女。

㉒ 《迦茵小传》，原著为英国哈葛德所作。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即包天笑等)的译文，仅为原著的前半部。一九一三年林琴南从哈葛德文集中，经过别人口述，把全文译出。

林琴南(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名林纾，福建闽县(今闽侯)人，早年曾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欧美等国文学作品一百多种，称“林译小说”，影响很大。晚年反对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成为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

㉓ 天虚我生，即鸳鸯蝴蝶派重要人物陈蝶仙，曾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编辑《申报》副刊《自由谈》，后又成为制造“无敌牌”牙粉的资本家。《眉语》月刊是鸳鸯蝴蝶派杂志之一，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出至十八期停刊(一九一六年三月)，主编是高剑华(许啸天之妻)，并不是天虚我生。

㉔ 伊孛生(一八二八——一九〇六)，现通译易卜生，挪威戏剧家，代表作为《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鼓吹个性解放，五四时期对我国知识界有不小影响。

㉕ 《终身大事》，胡适所作的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三号。剧本宣扬了资产阶级恋爱观点。

㉖ 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我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宣扬趣味主义的反动流派，起于一九〇八年左右，盛行于“五四”前后二十年间。主要阵地在上海。该派作者大都受封建文化的长期教养，又受到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站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文学作为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玩物；作品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宣扬哀情、神怪、黑幕、武侠等等，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起着毒害和

麻痹人民的作用。早期作品用文言文写作；后来改用白话，主要刊物为《小说时报》（一九〇九年创刊）、《小说月报》（一九一〇年创刊）、《民权素》（一九一四年创刊）、《小说丛报》（一九一五年创刊）、《礼拜六》（一九一四年创刊，前后共出二百期）等。该派在旧中国的出版、新闻、广播、电影、戏剧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势力。代表作家有徐枕亚、李定夷、张恨水等。“五四”时期，鲁迅和其他新文艺工作者曾对该派进行过尖锐批判；抗日战争后，其影响逐渐消失。

⑳ 诺拉，一译娜拉，易卜生剧本《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中的主角。该剧以娜拉从家中出走告终。

㉑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的新文学团体，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鲁迅这儿说的“广告”，指《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由郁达夫执笔，登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时事新报》上，内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话。

㉒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期上，有署名佩韦的在《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一文中，把“无神论”一词误译为“雅典主义”；成仿吾即写了一篇题为《“雅典主义”》的文章加以批评。

㉓ Yes, No, 英语“是”，“不”的意思。

㉔ 吴宓，美国留学生，曾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学衡》杂志主编。

㉕ 《小说月报》，创刊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王蕴章（西神）主编，一九一二年由恽铁樵主编，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由王蕴章主编，直到一九二〇年底，一直是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从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成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内容有所改革，提倡新文学运动，因而遭到鸳鸯蝴蝶派的攻击。一九二三年一月，商务印书馆撤换主编沈雁冰（即茅盾），改由郑振铎主编；同年五月创刊《小说世界》，由鸳鸯蝴蝶派叶劲风主编，该刊出至第

十八卷第四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⑳ 张资平,初为创造社成员,专写三角恋爱黄色小说,后变为汉奸文人。

㉑ “若干新份子”,指一九二七年底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以及曾参加北伐,后逃至上海的阳翰笙、李一氓等人。他们参加创造社后,改组了《创造月刊》,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月分别创刊杂志《文化批判》、《流沙》,以此为阵地,大力鼓吹“革命文学”,并发表了许多攻击鲁迅的文章。

㉒ 克鲁巴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现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

㉓ 冈却罗夫(一八一二——一八九一),现通译冈察洛夫,俄国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

㉔ 见叶灵凤的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的主角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㉕ 向培良,原为狂飙社重要成员,后变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走卒。一九二九年在上海主编《青春月刊》,提倡所谓“人类底艺术”。

㉖ 见《诗·小雅·常棣》,谓兄弟相争于内,引申为内部相争。阋(xì戏),互相谩骂争斗。

㉗ 《列宁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原名《中国青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主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称《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再改名为《列宁青年》,在上海秘密出版。一九三二年停刊。

㉘ 按檀道济应为韩信。事见宋朝江少虞著《事实类苑》:“党进不识文字,……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令杖之。”



④ 维多利亚朝,英国女王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在位期间(一八三七——一九〇一)。在这期间,英国统治阶级扩大对殖民地的掠夺,一度取得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

④ 刘易士(一八八五——一九五一),美国小说家。一九三〇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巴比特》《马丁·亚罗史密斯》等。

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一八三三——一八九六)的遗产设立的奖金。根据他的遗嘱规定,将其遗产一部分共九百二十万美元作基金,以年息约二十万美元分设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五种奖金,每年十二月十日颁发。

# “民族主义文学”的 任务和运命<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

—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sup>②</sup>。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sup>③</sup>。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艺术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sup>④</sup>呀，民

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sup>⑤</sup>，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艺术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

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命运，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sup>⑥</sup>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sup>⑦</sup>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刺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sup>⑧</sup>的战士，站在野蛮的非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

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非洲的阿刺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基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象腊丁民族，条顿民族<sup>⑨</sup>了的缘故。

### 三

黄震遐<sup>⑩</sup>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sup>⑪</sup>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sup>⑫</sup>，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鞑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sup>⑬</sup>——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螭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 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sup>⑭</sup>,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鞑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sup>⑮</sup>,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已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象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象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sup>⑬</sup>。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非洲的阿刺伯人了吗？！

##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象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  
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  
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给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sup>①</sup>，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sup>⑮</sup>，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sup>⑯</sup>？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sup>⑰</sup>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象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sup>⑱</sup>，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sup>⑳</sup>，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沈静中就显得更加露

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直接策划的卖国主义文学运动。它妄图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实质，配合主子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对抗以鲁迅为首的

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〇年六月由国民党特务和走狗文人王平陵、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等发起，主要刊物有《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

② 莠(yǒu 友)，恶草的通称。“莠民”，就是坏人。这是反动派对革命群众的诬蔑称呼。

③ 指与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上海租界里帝国主义走狗、流氓头子勾结，并且拜这些流氓头子做师父和干爷的“文学家”，如上海文艺界的张若谷、穆时英之流。

④ 国粹主义，是一种主张维护中国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排斥进步文化的复古思想。

⑤ “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篇。原指春秋时蔡、卫等国为周王伐郑打头阵的事。这里是用来揭露“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就是为日寇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⑥ 宣言，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载一九三〇年六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⑦ 指一九三〇年五月至十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争发生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历时半年，双方死伤三十万人。

⑧ 腊丁今通译拉丁，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人。

⑨ 条顿民族，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分布于瑞士、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德意志、英吉利等处。

⑩ 黄震遐，国民党文化特务，“民族主义文学”的干将。

⑪ 安南，即今印度支那；“法国的安南兵”，指法国侵略非洲时在安南招募的雇佣军；“客军”，就是在非洲的法国侵略军。黄震遐“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是为了避免更明显地暴露他自己甘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真面目。

⑫ 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即元太祖。拔都(一二〇九——一二五六),蒙古族钦察汗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的孙子。

⑬ 鞑靼、女真、契丹,都是古时中国北方的民族。

⑭ “黄祸”论,是极端反动的“种族论”。德国皇帝威廉第二(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就是这种反动谬论的提倡者和鼓吹者。他把当时亚洲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歪曲成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诬蔑为“黄祸”,用以在欧洲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欧洲革命人民的视线,从而为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革命,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制造烟幕。

⑮ 赵构(一一〇七——一一八七),即宋高宗,南宋皇帝。

⑯ 指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九·一八”事变之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朝鲜的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发生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⑰ 发扬踔(chuō 戳)厉,奋发有为、意气昂扬的样子。

⑱ 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

⑲ 赵家末叶,指宋末宁宗时代,因宋王朝的统治者姓赵,所以称赵家末叶。宋为元所灭,元世祖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孙子)是蒙古人,所以说是蒙古人的淫掠场。

⑳ 语出《论语》。夷狄,古代统治者对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的诬蔑称呼。诸夏,指中国。

㉑ 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

㉒ 城下之盟,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盟约,常泛指屈膝投降的行为。

# “友邦惊诧”论<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sup>②</sup>，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sup>③</sup>，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sup>④</sup>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sup>⑤</sup>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sup>⑥</sup>，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象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象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象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象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

“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南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

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到一个月，东北三省沦于敌手。当时蒋介石集团束手无策，哀求“国联”，而国联正是操纵在英法帝国主义手中的侵略工具。他们偏袒日寇，对当时中国人民反帝斗争，肆意诬蔑，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伪“国民政府”通电各军政当局，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进行大肆攻击，迎合帝国主义的旨意叫嚷什么“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并“行令仰各该绥靖主任各省市政府公署，嗣后遇有学生团体出境，赴各地游行示威者，各该地军民长官，务必负责严行制止，如有危险情事发生，即予紧急处置”，加紧对爱国运动的镇压。鲁迅对这些反动谬论给予迎头痛击，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京、津、沪、汉、粤等地学生为了反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组成代表团到南京请愿示威，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外交部。此处指的就是这一事件。

③ 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成立于一九二〇年，是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操纵国际事务、推行战争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陷于瓦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无耻宣称:“此时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④ 冯庸大学,是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个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停办。

⑤ 国将不国,国家将不象个国家的样子了。

⑥ 空前水灾,指一九三一年湖南、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七省发生的大水灾,受灾人民将近一亿。

# 答北斗杂志社问<sup>①</sup>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一九三一年)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sup>②</sup>，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sup>③</sup>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 Sketch<sup>④</sup>，决不将 Sketch 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北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创刊，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这篇文章是鲁迅创作经验的总结。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光辉著作中引用了鲁迅这篇文章列举的第一、二、四、六条写作规则，号召我们学习鲁迅反对新旧八股的革命精神。

② “宿见”，平素已有的见解。

③ 模特儿，英语 Model 的音译。原意是“模型”，主要指绘画、雕塑时充当模型的人；文学创作中称“原型”。这里指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的原型。

④ Sketch，英语，即速写。

# 《三闲集》序言<sup>①</sup>

(一九三二年)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編集是还想編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sup>②</sup>，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

“杂感家”这一个恶谥<sup>③</sup>。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象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sup>④</sup>，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sup>⑤</sup>，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sup>⑥</sup>，“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sup>⑦</sup>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白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sup>⑧</sup>，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sup>⑨</sup>，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sup>⑩</sup>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

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sup>⑩</sup>。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sup>⑪</sup>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sup>⑫</sup>，第二天便是这《无

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sup>④</sup>，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sup>⑤</sup>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sup>⑥</sup>。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 注 释

① 《三闲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入他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所写的杂文，以及一九二七年《而已集》未收入的杂文，共三十四篇，书末附有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本书编于一九三二年四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序言除介绍这些杂文写作的背景外，还着重叙述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作者的思想变化。这是作者一生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从此作者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② 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犯上海的事件。当时鲁迅住在上海，住所受到日寇炮火的威胁。

③ 这是买办文人梁实秋攻击鲁迅的话。谥(shì 试)，封建时代在人死之后按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恶谥，坏的称号。

④ 作者这些讲演稿大部分没有保存，其中仅保存下来的两篇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燕京大学的讲演，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已分别收入《集外集》和《三闲集》。

⑤ 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作者在广州目睹的白色恐怖的事实。

⑥ 一九二七年创造社的刊物《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登了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攻击鲁迅是“有闲阶级”，并说：“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⑦ “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都见一九二八年八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该文诬蔑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又说：“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按 Fascist，现在通译为“法西斯蒂”，也译为“棒喝主义者”）。“没落者”，见一九二八年五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署名石厚生（即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该文攻击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

⑧ 廖君即廖立峨，鲁迅在中山大学时的一个学生。

⑨ 《语丝》，参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②。

⑩ 《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前者收有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间对于鲁迅和他的作品的许多评论文章；后者收有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论争的一些主要文章。

⑪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对于革命作家所惯用的诬蔑和



陷害的手段。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的《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就含沙射影地诬蔑鲁迅等革命作家“到××党去领卢布”。

⑫ 一九二八年八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诬蔑鲁迅：“‘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⑬ 这篇文章，后来找到，收入《集外集拾遗》中。

⑭ 成仿吾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错误地攻击鲁迅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借成仿吾的话把这本杂文集定名为《三闲集》。

⑮ 锻炼周纳法，即滥用法律千方百计地陷人于罪的方法。

⑯ “刀笔”，是刀笔吏的简称，旧时称诉讼师为刀笔吏。这里引申为“刀笔吏”惯用的那套本领、办法。

# 《二心集》序言<sup>①</sup>

(一九三二年)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sup>②</sup>，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sup>③</sup>，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sup>④</sup>。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

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sup>⑤</sup>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sup>⑥</sup>。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象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sup>⑦</sup>，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sup>⑧</sup>，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sup>⑨</sup>，腹诽<sup>⑩</sup>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 (Franz Mehring)<sup>①</sup> 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sup>②</sup>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sup>③</sup>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和有产阶级”<sup>④</sup>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

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 注 释

① 《二心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入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两年间所写的杂文，共三十八篇。本书编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局出版。

鲁迅坚定地走上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后，反动报纸曾嘲笑他“投降”，国民党御用文人还专门写过一篇《文坛贰臣传》对他进行揶揄和奚落。鲁迅反其意而用之，采来作为书名，表明了他对“熟识的本阶级”的彻底背叛和决裂。面对着敌人的攻击、诬蔑和压迫，他毫无畏惧，勇敢战斗。

② 《奔流》，鲁迅主编的文艺月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③ 《萌芽》，文艺月刊。鲁迅为主编者之一。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〇年五月（出至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以后停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成为机关刊物之一。

④ 东汉末年，焦先因为逃避当时的战祸，隐居于武阳县，食、住在草窠里。

⑤ 戾(lì 利)，罪过。庶几，也许。

⑥ 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⑦ 参见《答有恒先生》注⑮。

⑧ 通海，里通外国的意思。

⑨ 唐朝韩愈《拘幽操——文王姜(yǒu 有)里》一诗中的句子。诛，

即杀头。

⑩ 腹诽,即口上不说,心里在骂。

⑪ 梅林格(一八四六——一九一九),通译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十一月革命时,参加建立德国共产党。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

⑫ 携贰,叛离的意思。

⑬ 参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及注释④。

⑭ 日本岩崎昶著。

# 论“第三种人”<sup>①</sup>

(一九三二年)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sup>②</sup>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sup>③</sup>,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sup>④</sup>。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sup>⑤</sup>,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

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sup>⑥</sup>，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sup>⑦</sup>；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sup>⑧</sup>，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sup>⑨</sup>。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sup>⑩</sup>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sup>⑪</sup>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sup>⑫</sup>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sup>⑬</sup>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竟于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文章，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也打着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旗号，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尽管他们旗号不同，都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恶毒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这篇文章痛斥了苏汶所谓“第三种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也揭穿了胡秋原的反革命面目。苏汶和胡秋原后来都做了蒋匪帮的文化特务。

② 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当时某些托洛茨基分子。胡秋原曾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宣扬文艺自由论，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他还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在一起，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③ 这是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该文反对左翼作家为工农创作连环画、唱本一类的普及作品，叫嚣：“恐怕每一个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都要反对。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

④ 这是苏汶自己捏造出来的话。他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

艺论辩》中说：“第三种人”“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哪一阶级的走狗”。

⑤ 这是苏汶对左翼作家的诬蔑。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把做不成“第三种人”而“搁笔”的责任推到左翼作家身上，胡说：“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⑥ 指向培良等人。

⑦ 苏汶曾经攻击左翼作家说：“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

⑧ “同路人”这一词，本是一九二一年前后苏联评论界用来称呼“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个资产阶级文学团体的作家的。意思是指那些在世界观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可以跟着无产阶级革命走一段路的人。

⑨ 弗罗培尔(一八二一——一八八〇)，通译福楼拜，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等。

⑩ 这是苏汶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的话：“总括拢来说，‘第三种人’的唯一出路并不是为着美而出卖自己，而是，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想要的）的东西吧。”

⑪ 密开朗该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通译米开朗哲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塑家、画家。

达文希(一四五二——一五一九)，通译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工程师。

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多以《新约》、《旧约》的故事为题材。

⑫ 《旧约》，即《旧约全书》，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前一部分，共三十九卷，主要内容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犹太民族古代历史的宗

教叙述等，形成于公元前五至二世纪，原用希伯来文写成，公元前二世纪译成希腊文。因写于基督教形成之前，故称《旧约》。

⑬ 这句话和下文的“怎么办呢？”，均见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

# “连环图画”辩护<sup>①</sup>

(一九三二年)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象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sup>②</sup>，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

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sup>③</sup>——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sup>④</sup>，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sup>⑤</sup>，《最后之晚餐》<sup>⑥</sup>，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sup>⑦</sup>。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sup>⑧</sup>，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sup>⑨</sup>，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贵。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 Doré)<sup>⑩</sup>，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sup>⑪</sup>，《失乐园》<sup>⑫</sup>，《吉河德先生》<sup>⑬</sup>，还有《十字军记》<sup>⑭</sup>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

宋人的《唐风图》<sup>⑮</sup>和《耕织图》<sup>⑯</sup>，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sup>⑰</sup>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

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夫人<sup>⑮</sup>。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

一,《农民斗争》(Bauernkrieg),金属版七幅;

二,《战争》(Der Krieg),木刻七幅;

三,《无产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 (Carl Meffert)<sup>⑯</sup>,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 Jagd 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 (Frans Masereel)<sup>⑰</sup>,是欧洲大战时候,象罗曼罗兰<sup>⑱</sup>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 München),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祷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数失记;  
六,《一个人的受难》(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 Gropper)<sup>②</sup>所画的书,据赵景深教授说,是“马戏的故事”,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sup>③</sup>

英国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

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号。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一九三二年，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同“第三种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三种人”的重要论点之一，就是鼓吹“创造”超阶级的、有永恒价值的“伟大艺术品”，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反对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鲁迅在本文中通过对“连环图画”这种艺术样式的介绍和分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艺术观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自诩高雅、轻视和排斥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通俗文艺的恶劣态度，热情地鼓励和引导年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去创作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指出：“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② 《现代》，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创刊的文艺月刊，由施蛰存、杜衡（苏汶）主编，后改为综合性期刊。

苏汶的文章，题目是《“第三种人”的出路》，载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的《现代》第一卷第六期。文中说：“文学形式低级到某一程度，它必然是要减少文学性的；欧化文学无论如何总是比连环图画进步的形式。这个，我想左翼文坛应该承认吧，否则他们也用不到说什么‘和群众一起提高文化水准’，因为连环图画就已经够高了。”

③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教皇，也叫“罗马教皇”，是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公元七五六年，建教皇国；一八七〇年，全

部并入意大利王国；一九二九年意大利政府与教皇签订“特拉兰条约”，承认梵蒂冈为独立国。梵蒂冈面积〇·四四平方公里，境内有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一译“圣伯多禄大教堂”，一四五〇年兴建，一六二六年建成）、梵蒂冈宫，建筑中保存着许多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文物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品。

④ 《旧约》，参见《论“第三种人”》注⑫。

耶稣，基督教的立教者和该教信奉的救世主。圣者，也称“圣徒”、“使徒”，圣经故事中耶稣选派负有传教使命的门徒，有十二人。《耶稣传》和《圣者传》，都是根据圣经故事编写的宣传基督教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的作品取材于上述诸书的故事。

⑤ 《亚当的创造》，又译《创造亚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刻家米开朗哲罗于一五〇八——一五一二年间所作的西斯庭礼拜堂拱顶壁画的一部分，取材于圣经故事。亚当，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

⑥ 《最后之晚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工程师达·芬奇于一四九五——一四九七年作于圣玛利亚·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画。取材于圣经故事中耶稣“受难”前夕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的故事。

⑦ 《亚当的创造》、《最后的晚餐》等作品，被资产阶级当作经典性艺术品；但是它们当时都十分强烈鲜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这些画都是一系列表现圣经故事的绘画的一部分，所以鲁迅也称之为“连环图画”。

⑧ 阿旃陀石窟 (Ajanta Cave Jemple)，今译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共二十九洞，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到公元后六、七世纪，营造达七百年，作品包括石刻佛像、壁画等；内容主要表现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宫廷生活情景。

⑨ 《孔子圣迹图》，是一部关于孔子生平的木刻连环图画。相传宋朝已有了；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初所刻，共三十六图；明万历年间的刻本有一百一十二幅。

⑩ 陀莱(一八三二——一八八三),法国画家,雕刻家。

⑪ 《神曲》,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二六五——一三二一)的代表作。

⑫ 《失乐园》,是英国诗人弥尔顿(一六〇八——一六七四)根据《圣经》传说写的无韵体史诗。

⑬ 《吉珂德先生》,即《堂·吉珂德先生传》,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一五四七——一六一六)作的长篇小说。

⑭ 《十字军记》,一部记述十一至十三世纪罗马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侵的著作。

⑮ 《唐风图》,一种描写唐代生活的多幅图画。

⑯ 《耕织图》,我国古代以农业生产为题材的连续性画册。南宋刘松年画过两卷;南宋楼璩画过《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流传有石刻本。

⑰ 仇英(一四九四——一五六一),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初为漆工,后从周臣学画。工人物、山水、花鸟。《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是他根据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故事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画成的多幅作品。

⑱ 珂勒惠支夫人(一八六七——一九四五),德国进步女版画家。初当刻铜艺徒,后习绘画。作品强烈表现了德国工农群众的苦难和斗争生活,版画线条雄劲,黑白强烈,人物形象坚实有力。“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后,她曾与世界进步艺术家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她的作品,由鲁迅介绍到中国。一九三五年九月,鲁迅为了“供给艺术青年参考”,以三闲书屋名义选印了一百〇三幅,一九三六年五月补印文字,装订成册,名《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

⑲ 梅斐尔德,现代德国版画家。

⑳ 麦绥莱勒(一八八九——?),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创作反军国主义的画,揭露教会和报纸。以后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作插图,创作了几套暴露资本主义黑暗的

木刻。他的创作追求强烈的黑白对比,有形式主义倾向。

⑳ 罗曼·罗兰(一八六六——一九四四),法国作家,音乐学家,初从事戏剧创作,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间出版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了资产阶级艺术家个人奋斗的一生;一九一三年侨居瑞士。十月革命后,曾著文表示拥护。

㉑ 格罗沛尔(一八九七——?),现代美国画家。作品多讽刺社会的腐败。

㉒ 英语,意思是: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

#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sup>①</sup>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一九三二年)

起应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埽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sup>②</sup>，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sup>③</sup>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sup>④</sup>。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

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sup>⑤</sup>，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象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sup>⑥</sup>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

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艺术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好。

鲁迅。 十二月十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通信”栏。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文学月报》，“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从第三期起由周起应（即周扬）主编。当时周扬一伙窃取了“左联”的领导岗位，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他们主办的刊物上充满了貌似很“左”，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文章。该刊第四期发表的芸生写的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即充满了“辱骂”和“恐吓”。鲁迅在给周扬的这封公开信中，通过对周扬一伙形“左”实右恶劣倾向的批判，尖锐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扬对于鲁迅的批判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口头上表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去理解”，暗中却与田汉等人密谋，布置同伙进行猖狂反扑。他们指使祝秀侠（笔名首甲），以及其他一些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在《现代文化》一卷第二期上，联名发表《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恶毒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鲁迅这封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是“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对此，鲁迅曾经愤怒指出：“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便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象见鬼”。

② 即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上的长诗《汉奸的供状》，署名芸生，其实是“左”倾盲动主义头子瞿秋白的作品。阿英在以“鹰隼”为笔名写的《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文汇报》）中有这样一段话：“秋白后期所作的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翻译了苏联别德内依骂托洛茨基的长诗《没有工夫唾骂》以后所作的《汉奸的供状》。”阿英是原《文学月报》编辑，《汉奸的供状》一稿的经手人。

③ 指别德内依写的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有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文学月报》第三期。

④ 《汉奸的供状》是借口批判“自由人”胡秋原的，诗的第二句是：“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做立夫。”

⑤ 指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写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发表在同年五月七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九期，后编入《三闲集》）。在这篇文章

里鲁迅对当时成仿吾等用鲁迅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材料”进行了批驳。

⑥《汉奸的供状》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鲁迅杂文选 上 1918 - 1932

作者 =

页数 = 245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我之节烈观  
《呐喊》自序  
未有天才之前  
忽然想到（五至六）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点比喻  
我还不能“带住”  
无花的蔷薇之二  
纪念刘和珍君  
写在《坟》后面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答有恒先生  
文艺与革命  
铲共大观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好政府主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上海文艺之一瞥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友邦惊诧”论  
答北斗杂志社问  
《三闲集》序言  
《二心集》序言  
论“第三种人”  
“连环图画”辩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